

中國教會

何去何從？



梁作祿神父 著
聖神研究中心 出版

有關本書：

中國教會何去何從，一直是幾百年來令人關注的問題。一如本書所提到，中國教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深重威脅，直接涉及教會本質。負責「管理」教會以及其他四個宗教群體這類少數群體的國家機構，深受強制接受主教祝聖活動的壓力，他們被迫在一個教宗所明確反對的實況上參與。一方面，合法的主教受到迫逼去主持這些非法主教的祝聖禮；另一方面，非法的主教現身在合法的祝聖禮又為教會群體帶來傷痛及分裂。此外，二零一二年上海新任的輔理主教馬達欽主教只因公開宣佈放棄在愛國會的職位，即遭到愛國會及有關方面禁錮及強行剝奪他的主教職務。凡此種種，都反映出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七年呼籲所有天主教徒為中國教會祈禱，實有迫切的必要。現任教宗方濟各亦確認這項呼籲，而且顯得更有急切的必要性。

有關本書作者：

梁作祿神父 (Fr. Angelo S. Lazzarotto, PIME) 生於一九二五年，於一九五七年初度前來香港服務，一九六五年奉委回到羅馬，在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中樞工作了十二個年頭。一九七九年他再度來港，得到胡振中主教的邀請，致力於接觸中國文化機構及復甦中的天主教會團體，他亦對在一九八零年成立的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及其出版的《鼎》雙語期刊，貢獻良多。一九八二年，他在香港以英文出版了《文革後的中國天主教》一書，其後更譯為中文發行。數十年來，梁作祿神父一直致力與中國的社會及宗教組織建立友誼。他著作甚豐，廣及歷史研究、個人經驗反省，以及對時事的評論。



中國教會 何去何從？

梁作祿神父 著

聖神研究中心 出版

中國教會何去何從？

作者：梁作祿

（中譯本稿件由梁作祿神父提供）

出版者：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黃竹坑惠福道六號

電話：(852)25530141

傳真：(852)28731545

電郵：hsstudyc@hsstudyc.org.hk

承印：建國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業發街 12 號松柏工業大廈 11 樓 A,B 室

電話：(852)25552212

ISBN：978-988-16476-2-7

二零一三年十月 初版

本書版權為作者及出版者所保有，翻印必究

目 錄

湯漢樞機序

作者前言

第一章 分裂危機重現 7

第二章 福音與中國相遇過程中的光明與陰影
. 35

第三章 當前危機如何形成 57

第四章 恢復對話之路崎嶇漫長 91

第五章 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唇齒相依
. 115

【後記】二零一二年以來的中國天主教會：

另一個困局——柯毅霖神父撰文 . . . 153

序

梁作祿神父與香港教區，以至與聖神研究中心及與本人，都堪稱老朋友。早在一九八零年敬愛的胡振中樞機授命本人成立聖神研究中心的時期開始，梁作祿神父就與我們保持密切的合作。在此之前，梁作祿神父亦已在香港教區服務過一段頗長的時間，故可以說他與中國人的情緣，由來已久。

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梁作祿神父一直熱心關注中國教會的發展；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他所撰寫的《文革後的中國天主教》，對海外人士認識重建中的中國教會，甚有幫助。

梁作祿神父亦身體力行，雖年屆高齡，仍不辭勞苦帶領國際上不同的天主教人士往訪中國，促進交談，加深相互了解，以求澄清誤會，消除歧見。但自二零一零年在中國再度發生非法祝聖主教事件以來，有鑑於中梵之間以至中國國內政府與教會之間的張力，梁作祿神父感到十分不安。為此，他特意在八十多歲高齡之際，振

筆疾書中國教會目前的矛盾及解困之道，以求能對中國教會有所貢獻。

梁作祿神父的這本新書，是他近年來關注中國教會發展觀察所得的精華，文中的觀點未必獲得每一位中國教會觀察家認同，但所陳述的事實及評論，卻實在是眾人所不能忽視的問題。梁作祿神父的新書原文為意大利文，現經多方面的努力，能以中文發行，對國內外關心中國教會的華文讀者來說，肯定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容我借這本新書的一角，謹向我的老朋友梁作祿神父致以衷心的祝賀，並向廣大的讀者送上熱誠的推介；希望更多讀者能從書中分享到梁作祿神父的精闢見解及對中國和中國教會的熱忱。

湯漢 樞機 謹識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暨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主任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

前言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次演說中，一再表揚亞洲天主教徒對信仰承諾和勇氣，他們「在思言行為上，清楚見證天主存在的重要性。」這讓人覺察到，亞洲的天主教徒如何以他們的信仰，為教會在第三個千年拓展了無垠的福傳領域。教宗在第二十五屆宗座教友委員會全體大會（2011年11月24日至26日）致辭時說：「在遼闊的亞洲大陸，既是眾多民族的家，亦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和宗教的起源，但時至今日，基督宗教的喜訊在亞洲只是傳頌給了少數人，然而，當中不少為了實踐信仰，無懼困難，甚至遭受迫害。」（《亞洲新聞》2011年11月25日）

綜觀亞洲，既看到希望又令人擔憂。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而其經濟和政治的地位顯赫，對全球勢力的平衡起作樞紐作用。縱使中國在今天已經不喜歡被稱為「中原大國」或「中華帝國」等明清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稱號，它地處中央，其數千年文明所確切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迹，而其儒家的傳統特

徵，也深深地影響著東亞的文化。

我們也不會忘記，直至上個世紀中葉以前，天主教會的傳教努力主要集中在中國。今天，我們感到悲喜交集：一方面是宣講福音的夢想，經歷很多代人的努力，最終有望成真；另一方面，痛苦的現實，卻在引領天主教會走向分裂的邊緣，有著不可預見的結果。

本書內容，涵蓋了近年在《給萬民》(*Ad Gentes*)半年刊發表過的多篇文章之要點。全書的主體共分為五章。第一章主要是簡述目前正在籠罩著中國天主教會之上的嚴峻險境，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形成。第二章是中國福傳經驗的概覽，其中特別提及所謂的「中國禮儀之爭」，一段令人難以釋懷的歷史。

接著的第三章詳細描述當前危機如何形成；第四章則指出何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困難重重。

最後第五章，概括了二零一二年初至今的複雜形勢，指出當中的困難，但也包括中國天主教團體的活力，以及強調了它的寶貴貢獻，就是普世教會的團結，在這樣困難的時候仍然支持它。普世教會的團結關懷，有助中國天主教會發展長成，容許天主教少數社群，積極地為社會發展方面作出貢獻。即使這細小的教會團

體，在成長和見證信仰時，可以讓整個教會作積極反省，提供了一個可信的模式，以實踐教宗本篤向所有信徒呼籲要邁向「新福傳」。

對於本書中文版的面世，筆者實在感到必須向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表達衷心的謝意；湯樞機不但指示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負責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工作，並在百忙中抽空為書本撰寫序言，令筆者感到萬分榮幸及溫暖。

本書附有一篇後記，是由我的修會兄弟柯毅霖神父（Fr. Gianni Criveller）撰寫，他是一位聞名的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學者，他對二零一二年前後中國教會的發展作一評論，亦實在使我由衷感謝。

梁作祿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

書於意大利米蘭市

第一章 分裂危機重現

「分裂」一詞是可怕的，尤其是對於一個歷代均為傳教象徵的國家；中國在上世紀初走出了千年以來帝皇權力的羈縛，對天主教或新教來說，當時都看似是福傳的好地方。

教廷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取消了令人悲嘆的「禮儀之爭」所帶來的禁制，對於天主教在中國推動福傳起了鼓舞作用。即使在二次大戰的毀滅性悲劇之後，對中國的傳教活動也躍增，截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計算，來華的外國傳教士較諸十年前更穩定得多。已居於中國三十三年，對華非常熟悉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總會長巴主教（Lorenzo M. Balconi），本著該會的開拓使命，派遣了十八位年輕傳教士來華服務。

教會在共產主義掌控中生存

然而，血流成河的中國內戰也愈演愈烈，逼使國民政府遠走台灣，而讓解放軍得以掌控整個大陸，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而往後的日子，整個大陸社會都深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所衝擊；韓戰又令社會問題更趨複雜，當時的日子異常艱苦。隨後的人民公社及大躍進等意識形態運動的出現，以至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專為揪出右傾份子而發起的百花運動，都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秩序。

不少於五千名立志盡心盡力在華傳教的男女傳教士，在經歷種種古怪的對待之後，都被逼離開中國，而脆弱的本地教會人士只得盡力支撐下去，而眼前的政權又認定宗教信仰是一種思想的扭曲，注定有一天會消失。毛澤東的政府亦模仿其蘇聯老大哥，宣稱憲法上人們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又制訂出一個有效的系統，即使是得到認可的宗教，也會被屈摺至完全切合政治計劃。（註一）

新中國將自己封閉在密不透風的竹幕之後，但也不能隔阻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在漢口（即現時的武漢

市)被迫自行祝聖兩位方濟會士爲主教的壞消息傳到西方，其向外界發出令人不安的警號，更甚於歐洲籍主教被驅逐出境的消息。

就在這境況下，剛剛就任不久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首次新樞機會議上對此予以譴責，他指出中國正「步上邁向悲慘分裂的路徑」，一個月後，他更促請大家爲「直接暴露於非常危險的災難性分裂」的中國神職人員及信眾祈禱。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開始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接見了一群代表著中國教會的主教(他們大多數是被驅逐出境)，聖座聽到不少關於神職人員在國家的種種強制措施之下仍表達出對教會忠貞的事例，因而決定不再使用「裂教」這種說法。但梵二會議得出一個結論，不會對非法祝聖主教事件的涉事者作出公開宣布絕罰，儘管當時在愛國會組織的第二次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舉行之後，全中國的非法主教已增至四十二人。

當時，從今天看已是半個世紀之前，毛澤東掌權的中國進入了近代史上一個災難性階段。這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象徵著所有宗教面臨結束，「教會」一詞都可能從文獻上消失；即使政權當局支持的主教及神父

們，也連同無數的信眾被關到勞改營。可幸的是，隨著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情況明顯改善，根據鄧小平的指望，鼓勵個人創業，又鼓勵中國要對外世界開放。過往的三十多年，教會的生活因此亦能漸次恢復和發展。在中國官僚重重障礙下，這得來真的不易。因為，由毛澤東所制訂下來的令人傷痛的「宗教政策」，至今基本上沒有改變。但近幾十年來，北京與梵蒂岡多次嘗試對話，當中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成功。

當前的嚴重危機

今日，我們再陷入另一重大危機，這危機是由負責宗教政策的人士所觸發。儘管教廷已作出明確的警告，但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承德（河北省）仍發生強行非法祝聖一位主教的事件，在接著的十二月七至九日，北京也強制舉行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與中國主教團（一會一團）召開的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也選任了不獲教廷認可的所謂的「中國主教團」和天主教愛國會的領導人，會議號稱是中國教會架構上所謂的最高權威。

接下來的數月，隨著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及七

月十四日分別在樂山（四川省）及汕頭（廣東省）再有非法祝聖主教事件發生，北京與羅馬間的對立更形顯眼，而教廷更首度宣布兩名因自願接受非法祝聖主教職而違反教會法的神父自科絕罰（*excommunication “latae sententiae”*），作為對事件的回應。此外，那些曾被誘導參加非法祝聖儀式的（已與羅馬共融）主教，也必須解釋他們的所為，並需要在公開場合表示懺悔，而中方也即時作出了堅決不讓步和輕蔑的反應。

本文以下集中對這數月來在教會神長或平信徒之間所取得的評論和擔憂來分析。早在二零一一年初，已有來自北京的流言譴責在天主教社群中出現的「困惑和恐懼」，該流言更提及羅馬可能對那些與聖座對立的群體，發表「正式宣稱裂教的聲明」。

情況給人一個難以捉摸的感覺。以致一位年輕的「愛國會」神父會說出：「我們何以要顧慮教廷呢？它不了解中國啊！」神學家方濟各·切斯科里（*Francesco Strazzari*）的觀察，總結是「那些堅持（中國人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就應以教會上的現用主義來回應。而又不致於扭曲宗教權利及人權。」（*Il Regno Attualita*, 2011年2月15日，第119頁）這肯定是條崎嶇的路，但也

許是值得關注的。

及後，詹弗蘭科·布魯內利（Gianfranco Brunelli）憶述六月二十九日及七月十四日兩宗非法祝聖事件，均犯上了「慣常技術」錯誤，即由與羅馬共融的主教替不獲羅馬接受的主教祝聖，因而更突顯出情況的嚴重性。他質疑說：「假使中國是繼續沿著與教廷公開對抗的方向發展，而梵蒂岡亦不能撤回絕罰的決定，一旦有近半數的主教陷於絕罰，這天主教會將變成怎麼樣？」所以他的想法是「梵蒂岡的新路線肯定會更嚴厲和堅定，但看來難達到預期目標。」他亦同時質疑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在接受《信仰社》訪問（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時提到，「探討主教可選擇要求自主的問題；以至要求對教廷獨立」等這些神學問題，大概是由歐美傳過來才「滲透中國教會」。（*Il Regno Attualita*, 2011年7月15日，第456頁）

七月八日由「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發言人楊宇神父指因為「中梵關係尚未正常化」，中國天主教會「爲了本國福傳牧靈的迫切需要」，中國教會選聖主教是「無可厚非」的。對此，駐羅馬的傑拉德·奧康奈爾（Gerard O'Connell）也在權威的《梵蒂岡內幕》網

站（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發表了評論，他指出楊宇的言論在大陸的著名天主教網頁中引起了不少負面的批評，並指出楊宇以《聖經》、教會傳統及早期教會史來自圓其說，這會引申出「教會體制有關部門正發展另一套教會神學，它跟普世教會的一套截然不同。」

另一種神學？

甘偉霖（William Grimm）從日本發表評論，因著近日愛爾蘭政府與教廷就神職人員性醜聞事件意見分歧的危機入手探討問題，他因著有些主教竟然容忍這些醜聞，從而質疑現今羅馬選任新主教的方式（跟聖安博及聖奧斯定時代有別），他論及中國教會面對的政府是將政策放在遠高於本地教會需要之上，因此高調地質疑梵蒂岡「沒能力或者壓根兒沒興趣著眼於按信眾的需要去選取主教」，他更提出疑問：「何以中國的天主教徒要被逼依附羅馬呢？」（註二）

大家都知道，地方教會的自主性（即使不致於達到具爭議的程度）在一些西方教會中早已是徹底辯論過的神學主題。然而，這些論題在中國內從來未能有心平氣和的反省，在過往這方面的論據只是被人借用來將政府

官方政策合理化。假如我們瀏覽過去三十年中國官方出版的神學及歷史雜誌《中國天主教》（英文為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就會得到這樣的印象。我們不能忽略，在今時今日這種由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教會言論，目的是要脫離羅馬，打著有中國特式及愛國主義旗號而自創「獨立自主的中國教會」。

中國官方媒體在與教廷對著幹一事角色重要，已眾所周知。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在英文《人民網》登出一篇文章，指稱「梵蒂岡的干預」在世界各地遭到譴責，文章首先提及曾被教宗保祿六世譽為「世上最富天主教色彩的國家」的愛爾蘭，文中引述了愛爾蘭總理恩達·肯尼（Enda Kenny）的話「我們厭倦了聽聖教法律，這是一個共和國，應是民事法的問題。」

該篇在《人民網》文章主要著墨於歷史，把梵蒂岡刻劃成「政治與經濟動物」，並把其枷鎖壓在新興國家身上，更強調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部分德國已擺脫了它。文章更認為中國並非在基督文化下成長，故更有理由質疑梵蒂岡在這遙遠之地委任神父的權力。

文章續指出「羅馬的司牧只是教宗其中一個稱號而已，他更是擁有具武器兵團、外交使團，以及銀行的一

國元首」。在歐洲這沒有大不了，「但中國則要抵抗把其原則加諸其身上的國家。」論及絕罰時，該文援引了（作為干預他國的佐證）在一九六零年代於荷蘭及比利時的天主教政界人物的觀點，結論時更引述把愛國置於愛護教會之上而沒自覺不稱職的愛爾蘭天主教徒。

另一方面，該篇文章的中文版亦刊登於《人民日報》的文章，確認「教會是個為全球成千上萬人帶來精神慰藉，教人欽敬的機構。」它也補充指教會「也是個務實」的架構，所以數百年來也能迄立不倒。今天：「必須意識到，中國不能接受一些沒份兒建立和商討的外來措施……」「梵蒂岡必得承認，像中國一樣的國家之潛力和文化差異」，「否則它會有被認為重世俗權力多於中國教友精神需要之虞。」（註三）

政治對共產黨的重要性

在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是近乎一種國家宗教，黨員和一般公民必須告明自己的罪過，並在偉大的領袖雕像或畫像前允諾改過。但後來許多事情都改變了；甚至黨內的權威聲音，都與馬克思主義內的偽科學觀，包括那種將宗教定性為「人民鴉片」的看法，劃清界線。

數年前的機密統計數字顯示，即使中國共產黨員之內，最少也有三分之一有宗教信仰：這是對貪腐及官方意識形態失望的明顯標示；顯然，有些新近重現的原教旨主義已愈來愈受歡迎。

雖然黨高層及政府官員參與處理天主教會的事已屢見不鮮，但這矛盾的狀況卻仍值得我們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同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號人物（他在政治局長達十年之久）的賈慶林，在這方面一直非常活躍；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天主教代表大會閉幕時，他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主教代表，並強調黨的傳統路線，以及「堅決抵禦境外勢力的各種滲透干擾」。但是只叫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時不少在場的天主教徒公開表示熱切回應。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國家宗教事務局於海南省海口市進行評估工作會議後，刊出了二零一零年工作報告，以及二零一一年的工作優次。為二零一一年來說，他們的重點是要帶領教會的「一會一團」，以充分落實第八次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的精神，加強在管理教會獨立自主的教育、民主管理，以及透過舉辦六個課程，深化逾千神職人員的培訓。該局官員並強調，要收緊外國人在

境內進行宗教活動的條例，以堵塞以宗教為藉口的外來滲透。(參閱《鼎》，2012年，第164期，英文第46頁)

這意味著透過宗教事務局，執政當局決意迫使中國教會強化那些抵觸普世天主教傳統的教義路線及牧民路線。而事實上，在一個月後(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他們在雲南省昆明召見了「一會一團」的領導人，更為接下來的主教祝聖定下方案。(英文第47頁)

然後，在北京進行的「一會一團」(刻意的，永遠是放愛國會在主教團之前)第三次會議，發言人楊宇神父在六月二十三日重申，為了教會的發展和福傳，中國教會急需為九十四個教區中那四十四個有主教出缺教區的選任新主教，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等會議上主要講話的，一再是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

六月二十九日在樂山以及七月十四日於汕頭的兩宗非法祝聖，明顯是直接挑戰教廷。更甚的是，國家宗教事務局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發布了一份《中國天主教堂區司鐸任職辦法》文件，並即時生效，進一步干預教會事務。(《鼎》164期，英文第57頁)

中國天主教會再一次顯示實質上是由愛國會與主教團共同管理事務，他們於八月二十二日任命北京的全

國修院的新董事會。房興耀和馬英林分別成爲董事會主席及副主席，馬更兼任修院院長。（英文第 57 頁）

不少中外觀察家都認爲，這些對天主教會施加的極度壓力，顯示了左傾勢力在中國政權中抬頭，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通過的《刑法》修訂案，把「監視居住」合法化。凡被認定爲可疑及對他人有危險者，即使未經審訊，或沒有具指控，也會出現所謂「強逼失蹤」。

著名的異見人士魏京生更直言這是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時代。（2011 年 9 月 19 日《亞洲新聞》）當局此舉也許是爲了要防止被那影響世界各地的「茉莉花革命」所波及。對中國事務有深入認識的香港分析家林立指出，左傾趨勢早於草擬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時已浮現。這「十二五計劃」在二零一一年春天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

此外，據報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中旬舉行的中共的十七大六中全會上，總書記胡錦濤（他亦是中國國家主席）指責一些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並要堅持加強「社會主義文化」。這篇演說的摘要，刊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中共黨刊《求是》雜誌。（2012 年 1 月 2 日《亞洲新聞》及 2012 年 1

月3日意大利《晚郵報》)

在此之前一個月，該雜誌也發表了由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的署名，結合中央委員會討論結果的文章；文中朱維群抨擊黨員的信仰宗教，指這會削弱黨對宗教的控制。他強調宗教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不能並存，其矛頭更特別指向天主教。通常處理黨員意識形態路線的應是中宣部。由統戰部高調重彈毛派極端主義，顯示出這是共產黨針對宗教發出的「指導意見」，突顯了他們對這些事情特別關注。(2011年12月19日《南華早報》；2011年12月20日《亞洲新聞》)

朱維群近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重申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文化滲透，是以基督宗教宣傳為主要武器。不少政壇中人也視天主教會為導致波蘭的共產主義崩潰的主因。但另一方面，當局亦實際上對傳統神祇，如佛教和道教，則有更大的容忍，這也許是要填補不容忽視的信仰上的空白。

《亞洲新聞》社長貝納德(Bernardo Cervellera)稱之為新版本的毛派色調，是在主席胡錦濤及總理等國家元首換界之際的領導層權力鬥爭。不過，根據不同觀察員的分析，中共方面推動這三宗非法祝聖天主教的動機

實在是「難以理解」的，不知這些決定是否也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但顯而易見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歷史之後，內部派別仍然存在，對最低程度的宗教自由也不願意確立。

曾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宗教研究部負責人的任延黎教授指出，對於非法祝聖等事件，認為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對待宗教的原則，扭轉了中國革命的方向，竭力要把政府拖入與宗教紛爭的泥潭中，做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都不會去做的事。」他說：「中國奉行政教分離的原則，天主教不是中國的國教，天主教事務不是中國的國家事務，國家不應辦教，教職人員也不應在政治機構中擔任職務，天主教會的事情應由教會自己處理。」（《天亞社》，2011年7月22日）

軟硬兼施手段

在如此社會背景下，作為少數社群的天主教無可避免深受影響。不獲國家承認的天主教群體固然經常受到警方的監視；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四位「地下」神父在山東被捕，九月份，另一群神職人員在甘肅遭到同一對待。然而，官方認可的公開教會架構也被嚴重操控，而

他們採取的都是經典的軟硬兼施手法。一位看來是與羅馬共融的年輕的山西主教，被問到何以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天主教代表會議時，他表示若不出席意味了與地方政府對著幹，這會令教區工作流於癱瘓。

一位中國神父曾投訴牧民活動受政治利益污染。他提及一宗極端事件，在二零一零年河北省官員試圖以一位共產黨副部長出任該省天主教神哲學院的領導層（因修院罷課抗議而使企圖不得逞）。他亦指出，在公告欄和某些「公開」教會的聖堂牆壁上都不難看到由「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張貼了他們的規章，這令教會產生衝突和分裂，因為「地下」天主教徒從來不承認這些由政府支持架構，認為這些規章是一種侮辱。神父也表示，「民主辦教」的程度有時過份至容許教外的人干預教會運作和對主教侵權，這都是不能再忍受。

近年發生的事件證實了在中國教會瀰漫著混亂和危險的氛圍。二零一一年八月，超過二十位來自愛國會及（官方）主教團的主教、神父和修女被傳召到哈爾濱參與為期一週的學習班及其後的文化之旅，這一切都是由黨的統一戰線及宗教事務局策劃，活動過程均由政府官員陪同。這情況也發生在北京，中共統一戰線部的杜

青林部長和他的副手朱維群，加上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共同安排了一個會議，與會的還包括了兩位近期接受非法祝聖（且遭絕罰）的主教。在該次行程中，一些與會者顯然不願在彌撒中與他們共祭，但據「一位來自華北神父」的指出，當他們甫抵北京，即在八月二十三日於北京南堂參與由當地教區合法主教李山主持的彌撒。不過，「那裏有十多位主教，包括了不合法的，如馬英林（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當選主教團主席）、詹思祿、郭金才、黃炳章及雷世銀等等，相信都有出席。」當時共祭的主教還包括了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當選愛國會主席的山東臨沂教區的房興耀，他主持了樂山和汕頭兩宗非法祝聖。

對這訊息的準確性我無從查核，但這位「來自華北的神父」指出「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均認為此事乃對梵蒂岡的挑釁，」但他們亦強調，「雖然他們心靈受創，但仍懷著信念等待，希望他們的主教會因著信仰而悔過。」（2011年8月22日、9月4日及9月9日《天亞社》）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四川宜賓教區本來出現一個亮麗的祝聖禮；由羅馬及北京均承認的九十五歲主教陳適中，為其助理主教羅雪剛祝聖；然而痛苦和

困惑的事情也同時發生，因為非法祝聖而遭受絕罰的樂山雷世銀主教也出席了這禮儀。教廷發言人隆巴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評論此事說，在正常情況下，絕對不該讓雷世銀主教出席，而其他出席的主教亦要承擔教會法的後果。但在具體的情況下，或許這些主教為免牽涉到其他嚴重的麻煩而無法阻止他的出席。雷世銀為四川省愛國會主席，也得到政府的公開支持。（《新力社》，2011年11月1日）

雷世銀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出席了四川省南充教區的新主教祝聖禮重施故技，香港天主教週報《英文公教報》也把此事放在頭版撰文，指稱「非法主教出席擾亂了祝聖禮」。這次祝聖禮的主角是四十七歲的新主教陳功鰲，他是南充教區的教區長，也是四川天主教神學院院長，深受各方面敬重。他早在十年前已獲教廷批准，而政府也在二零一零年同意他的祝聖，他表示其首要任務是神父、修女和修生的培育，並鼓勵其教區八萬六千信眾為傳教作貢獻。據《亞洲新聞》引述當天出席禮儀的人的感受，他們認為受絕罰的雷世銀主教的出現，催化了中國教會團體進一步分裂。（《英文公教報》，2012年4月29日）

信眾陷於困惑

對於那些與羅馬共融，卻被逼進行非法祝聖的主教之立場是不清晰的，也導致教友疑惑：他們委實不能反對嗎？此外，非法主教的牧民管轄也嚴重的影響了正常的信仰生活。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非法祝聖的馬英林主教在其昆明（雲南）教區的石林鄉郊地區祝聖了六位執事。

昆明當時仍有一位為教區承認的老教區長張文昌神父，他因患上末期癌病而住院，馬英林雖然也探望過他幾次，但據一些法學家觀察，馬並沒有向張索取教會法所需要的委任信件。張文昌神父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五日安息主懷，而事件變得更嚴重的是馬英林在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決定祝聖六位執事為神父，其中三人來自鄰近大理教區，並分別屬於藏族、苗族及景頗族。大理教區現今只有神父和修女各三人，但天主教徒卻有八萬，他們大部分是散居於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

教會觀察家認為馬英林沒必要違反教會法以對政府官員表示忠誠，因為更甚者是其行為使被他祝聖的新神父都按聖教法典變得不合法，他其實可以把執事送到合法主教那裏被祝聖，（《英文公教報》，2012年3月25

日)，而事實上，汕頭教區選出非法主教黃炳章，也是他的選擇。

由於汕頭教區有三位執事準備祝聖為神父，黃炳章沒有自行祝聖他們，卻把他們送到江蘇的南通（海門）教區，由合法的主教沈斌在十月二十七日祝聖；黃炳章雖沒有出席典禮，但他們的行為仍未能算是按聖教法典進行，因為黃炳章未有諮詢汕頭的合法但不被政府認可的首牧莊建堅主教。（《天亞社》，2011年12月14日）

關於這個教區，一些中國博客曾表示不滿，地下主教莊建堅未獲羅馬澄清其身份，甚至在教廷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Bertone）的二零零八年主教名單也榜上無名。他們亦提出關於梵蒂岡揀選主教的政策疑問：「是不是那些被教宗拒絕選取的主教，會不如被揀選為合法主教的那麼忠誠呢？」（《天亞社》及《英文公教報》2011年7月8日）

有一位署名「觀山看霧」的地下神父不滿梵蒂岡某些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缺乏對他們的關懷，因此「讓問題越積越多」，更是「形成了可怕官僚作風而不是兄弟之情」。（《天亞社》及《英文公教報》，2011年4月24日）。他認為教廷承認愛國會所認可的主教，結果是政

府的勝利。教會專家的到訪，不可能接觸到地下團體，只能提供單方面的關係。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七年寫給中國天主教徒的信似乎像「一線希望」，但自那時以來，在中國教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一直未有澄清。

然而，也有意想不到的事，一位福建的天主教徒，在給《英文公教報》的信（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第3頁），提到了他所屬的教區情況頗複雜，它是其中一個最古老的教區—閩東教區，官方團體只佔天主教徒的百分之三，全教區約五十位神父中佔五位，不過政府卻公開支持那裏的非法主教詹思祿。（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祝聖）正當大家都感到困惑之際，最近在穆陽鎮有一間新裝修的聖堂舉行奉獻禮，而主持禮儀的正是詹思祿，及後有屬於地上的三位新神父被祝聖了（自此之後公開的神父增至八人）；這個晉鐸是由廈門教區蔡炳瑞主教主持，他是獲教宗批准的。應指出詹思祿幾年來一直未有主持任何祝聖禮，目的顯然是爲了避免當地的教友對他僅有的幾名的司鐸作出批評。

該位教友指出，這些事件在天主教團體內造成混亂，在邀請廈門主教一事上人們從未諮詢就八十九歲的閩東教區合法主教黃守誠的意見，而在閩東教區也發生

了新衝突，就是寧德區塔山村的所有地下天主教徒都把聖堂大門關上，不讓獲地方政府支持的非法祝聖主教詹思祿進來派駐公開神父以取代地下神父。（參閱《鼎》，164期，英文第50頁）

從大勢來考慮當前的危機，柯毅霖神父（Fr. Gianni Criveller）表示擔憂「夾在政府官員游說攻勢與教廷遙不可及這實況下的中國主教和司鐸，在缺乏對外的有效溝通之餘，會日漸靠攏那些向他們反覆灌輸的民族主義，甚至心存感激。」（《給萬民》，第6頁）

出現「官方主教」的危險

意大利的桑德羅·馬基達（Sandro Magister）在一篇文章中譴責「官方主教」（即那些不跟伯多祿繼承者團結共融的主教，他們的行為就如該帝國的官員）（www.chiesa 網站，2011年7月22日），他指出「如果將那些肯定受絕罰的主教，加上『推定有罪』的主教（即那些雖獲教宗承認，卻向政權歸順的），再加上那些不獲教宗承認的，目前共約有二十多位，處於與羅馬分裂的狀態。」

這些分裂使不少地方教會受著折磨，而神父和團體

之間的分歧亦令問題變得更複雜。今時今日不少年輕主教要肩負領導中國教會的責任，他們極度需要教友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那些教友已克服奉承文化和權力威脅，亦學懂了如何付出。現代的通訊技術可促進對話，不過接觸仍存在困難，尤其是那些分散於鄉村地區的天主教少數社群。當前的推諉的風氣和混亂所帶來的不可預見的風險，將再度帶來了前述造成分裂的嚇人現象。

從前於上海傳教的耶穌會士彭永年（Andre Bonnichon）早在半世紀前當他還未被驅逐出境時，已就他在中國觀察到的危機寫過一篇非常切合這篇文章。（“Naissance des schismes”, Etudes, 巴黎，1956年，第29-44頁）他憶述一位來自大城市的中國主教對他說：「一股頑強的（推向）分裂力量可預見，並可能威脅到天主教會的團結。」

彭永年亦評論說：「群眾可能不自覺地傳播分裂心態，也可能因為教會領袖道德上的弱點，在信眾中誘導出有意無意之間的分裂意識。」這種牧者的道德上弱點以及信眾有意無意之間的行為，正好是導致教會中的分歧及未化解的衝突，演變成脫離普世教會的因素。當人有私底下的事業野心，又受到政權催化，並在得到牧民

上的藉口（為確保在教區的生活功能）作掩飾之下，這些分裂的威脅更形嚴重。

正因為這種種的事，所以在汕頭非法主教祝聖後，詹尼·瓦特倫（Gianni Valente）為其文章起了「中國人當中趨向分裂嗎？」的煽動性標題（《梵蒂岡內幕》，2011年7月15日）也就不足為怪了。瓦特倫認為近期兩次非法祝聖及教廷隨即宣布的絕罰之後，是「觸發了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政教機制中的海嘯。」他憶起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為止，在八十多位中國主教（大部份為近年所選）中，只有五位不獲羅馬承認。他重申在如此混亂和緊張的形勢下，「是引發分裂的適切條件」。

瓦特倫在隨後的另一篇深入分析（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之中，指出當前的危機也受到教廷出現不同立場的影響。他提到以一九八八年傳信部所發出的指令為例，嚴禁任何人與隸屬愛國會的主教及神父有「聖事上的共融」。此舉讓那些否定「公開教會」禮儀及聖事合法性的人士更能有力堅持。

他也列舉出中國教會一些英雄人物，如段蔭明主教、李篤安主教等，他們既能接受作為愛國會成員的事實，但在這類政權控制的半國家機構內，他們捍衛了自

己對伯多祿繼承人的忠誠，……時至今日，新一代的神父及年輕的主教，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所謂地下的，都出現「自相矛盾的事業野心」，這場瘟疫不幸的是不僅發生於中國。整個教會往往是「主教任命或者從一個教區調到另一個，會被視為在這個環球性官僚體制機構中得到獎賞和榮譽，反映了他們拉攏關係及建構權勢的技巧及能力。」

意大利觀察家方濟各·西斯齊（Francesco Sisci）也有相同的見解：「現況是一些中國天主教徒搖擺不定地處於分裂邊緣，而他們也難以改正。中國的天主教徒怎能說：『我們不要教宗來干預。』因為在沒有教宗的情況下，他們會變成像基督新教一樣。」這就是「客觀地分裂教會的可能，正逐步走向真實了。」這將會是一個在神學理論上與羅馬相當接近的教會，卻不接受「教宗的干預」，這與英格蘭教會的情況有點相類似。另一方面，北京（或共產黨指示）沒打算由自己來擔當中國教會的領袖。說到底，中國教會仍只是個細小的群體。

西斯齊也觀察到中國懷疑梵蒂岡與美國與西方合謀，足以毀掉中國。但吊詭的是，教宗與中國政府雙方都同意二零零七年羅馬教宗信函的一些原則，包括「中

國不是有兩個教會，及中國只有一個合法政府。」在實踐之中，梵蒂岡並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運作，中共亦不了解梵方。（《亞洲時代在線》，2011年7月20日）

香港英文公教報《神州橋樑》，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四日的標題是：《哀歎步向分裂》。文章敘述了先知書上所記載巴比倫軍隊橫掃之後所餘下的蒼涼境況，也探討了基督宗教史上一些值得深入反省的重要片段，諸如羅馬宗座與君士坦丁堡教會在十一世紀時的互相施以絕罰，這情況直至由教宗保祿六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次會議結束時才平息。及後又有一五三四年十一月跟英國教會的分裂，其後直到於一九六零年起坎特伯雷大主教與羅馬才開始接觸及改善關係。（註四）

文章回顧中國現況，更提及人權和維權律師方面的不幸遭遇，他們都遭受武力鎮壓；宗教自由方面的遭遇也相類似，主教常遭暴力迫脅而出席不正常的主教祝聖禮。縱使各處都曾有人作出有力的反抗，「但在中國要制止新祝聖事件發生並不容易。」該篇文章從闡述古代將福音傳到亞洲的英雄事跡開始，論到今時今日的中國教會，即使與外界的往來和接觸都較從前容易，但難望獲得來自國外的援手。因為跟中國有交往的企業和政

府，都會以保障經濟利益為先。（更遑論那些對涉及侵犯弱小者的性醜聞所引發的不滿。）

該文章從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和教會生活的實況下，剖析目前北京和梵蒂岡之間的緊張形勢，對在一兩個「世紀」能達致全面和解不抱太大的期望。

誠然，文章稱，主教的甄選程序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國度都改變了，但中國政府如果以為「梵蒂岡會為了滿足愛國會而重寫《天主教法典》第一三八二條或其他規則，那是不切實際的。」但「假如中國內外的天主教徒，都希望國家能把《憲法》第三十六條最後一句『宗教團體及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一句刪除，同樣是不切實際的事。在另一方面，共產黨可能會繼續管治中國達一百年或兩百年之久，奢言任何一種主張都是沒意義的。」

「中國國內及國外的天主教徒，都必須持守祈禱、守齋和有恆心的信仰，以獲取恩寵，正如教宗所說，他們是真正天主教徒和真正中國人。」

在同一期的週報（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社論中，引述了「國際特赦組織」譴責中國人權狀況惡化，這源於共產黨感到人權對其產生威脅，但它亦觀察到願

意犧牲自由來參與維權的律師人數正在增加，他們極需要支持。香港的律師何俊仁指出，中國教會比過往更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中國對境外的意見很敏感，因此國際天主教團體有理由向北京施壓，並提高各國政府及人權組織對這方面的關注。◆

註釋

註一：參閱 Elisa Giunipero，《天主教與共產主義中國：從1949年革命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布雷西亞2007年。「中國天主教傳教工作與共產主義的相遇」一文，收錄在梁作祿編著的 *La Cina di Mao processa la Chiesa. I missionari del PIME nel Henan 1938-1954*, EMI, Bologna 2008, pp. 527.

註二：據《天亞社》2011年7月26日的文章，作者認為中國天主教會被政府及梵蒂岡以不同方式迫害，期盼能找出兩者之間的生存空間，並培養及找到選擇領袖的方法，也許可助教會改善僵化的制度。

註三：該篇《人民日報》文章，亦載於香港天主教周刊《英文公教報》，2011年8月21日。

註四：教宗本篤十六世2012年3月底訪問古巴時，幾份國

際媒體再次提及菲德爾·卡斯特羅 (Fidel Castro) 懷疑被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絕罰 (英文公教報《神州橋樑》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當時的秘書洛里思·卡波維拉總主教 (Loris Capovilla)，現年 96 歲，腦筋清晰，他堅決否認這一報導。在回答記者多維奇 (Gian Guido Vecchi) 時，總主教暗示這傳奇 50 年前已經開始流傳，當時適值意大利基督民主黨近乎要與左翼勢力成立聯合政府。他說，教宗對此指控感到非常不快。(意大利《晚郵報》，2012 年 3 月 28 日)

第二章 福音與中國相遇

過程中的光明與陰影

面對一個困難的將來，重溫過去歷史十分重要，將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有用的提示。回顧「中國大陸」的福傳史，在數個世紀前展開的傳教創舉中，充滿波折和英雄事跡，也不乏失敗事例；傳教士和信眾的實踐知識，所採納的方法和所面對的種種有利或不利的環境，有助我們在今日比較切實地闡釋當下的危機。

如果人們願意進一步瞭解這福傳史和知識，將受惠於現代訊息科技協助下不難搜索到的大量資料，也可在專門圖書館中揭示隱藏的寶藏，魯汶天主教大學的鐘鳴

且神父 (Nicolas Standaert) 朝著這方向苦幹。在二零零一年，他出版了關於基督宗教資料的第一卷 (近一千頁)，為學者及研究員提供了一個資料庫，包含由公元六三五年至一八零零年間的中國教會歷史數據資料。

(註一) 對於那些希望研究共產主義中國之前的時代，瞭解基督宗教在中國緩慢傳揚的情況，查考肯尼斯·斯科特·賴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的著作會有幫助。雖然此書已是一個世紀前出版，但仍是很可靠的研究資料。(註二)

同樣重要的還有沙百里 (Jean Pierre Charbonnier) 的著作，沙氏的書有別於過去這類書籍單純由傳教士敘述的風格，內容差不多全由福傳領袖、傳教士自述，並讓中國皈依信徒說出心底話。洛朗坦 (Rene Laurentin) 和杜小安 (Etienne Ducornet) 的著作，亦包含了評論和對未來的展望。(註三)

第一個接觸

在漫漫的教會歷史上，敘利亞教會的傳教熱誠值得敬佩。他們的隱修士早在公元六三五年已途經中亞絲綢之路抵達中國長安 (即今日的西安) 傳教，並獲當時的

唐朝皇帝太宗熱情款待，稱許道理上乘，是充滿生機而不可或缺的。公元七八一年，唐朝更在西安豎立了一塊巨碑，碑頭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上面以中文和敘利亞文刻上「景教」，意謂「光明的宗教」，「景者，大也，光明也。」，時至今日該塊大石仍屹立在西安碑林。瑪竇·尼各里尼—齊尼（Matteo Nicolini-Zani）在深入研究原始資料後，強調東方基督徒的經院式神蘊，富有中國宗教感，而佛教的寺院也對他們的文化生活有巨大影響。（註四）

不幸的是，在第九世紀中葉，景教遭到朝廷頒布諭令驅逐，（該諭令本來明顯是針對佛教而設，憂慮到佛教累積的財富會威脅朝廷的威權，）外來的基督宗教信仰從此在中國消失了。尼各里尼—齊尼相信，基督徒的修道院生活方式，甚至可以為今日遭物質主義侵蝕的中國社會的重建，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一二四五年教宗依諾增爵四世派遣了方濟會士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作其使節，到蒙古大可汗那裡結盟，以對抗伊斯蘭教的軍事擴張；所以從十三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再度獲得福傳。自此之後再有其他福傳團隊赴華，如另一位方濟會士羅伯魯

(Willem van Ruysbroeck)，在其報告中表示，來自敘利亞的經院會士當時在中國亦留有足跡。

一二六零年，另一批使節到訪當時的大都即今日北京，接觸忽必烈王朝；數年後，年輕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也到達了神秘的中國。一二九四年，教宗尼各老四世的使節孟高維諾神父(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排除萬難以新路線來華，他獲元朝皇室禮待，並可傳揚福音，使當時有眾多人皈依(約十年的統計，領洗者約有六千人)，並建立了一所教堂。新教宗格肋孟五世，在一三零七年任命他為北京的總主教，以及整個中國的宗主教；孟高維諾當時要待翌年方能從三位由羅馬特別派遣來的主教(他們從羅馬出發時原有七位的!)手中領受聖秩。

許多方濟會士都會表明自己，願意在特殊地方傳教和作出牧民承擔，其中包括和德里(Odorico da Pordenone，一七五五年列品真福)，他出發到中國時差不多五十歲，並經過漫長的旅程後，通過印度和錫蘭才到達中國；在短暫停留後，他回到歐洲給教宗帶來訊息。(註五)當一三二八年孟高維諾總主教懷安息時，中國教友人數約為六萬，許多方濟會士研究這時期的傳

教，都突顯了他們的極端慷慨熱忱。

孟高維諾對文化背景十分重視：在大都，他翻譯了聖詠和新約成蒙古語（維吾爾語），並以該語言唱出彌撒經文。不過，當時卻沒有足夠時間讓傳教的種子散播在中國的土壤之中。一三七零年，教宗烏班五世為北京總主教區任命了一位繼任人，但他從沒有踏足於中國。

與此同時，由於蒙古人的元朝被漢人起義推翻了，所以在十四世紀中葉的軍事和政治改變了環境；在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建立之初，漢族復仇的旗幟鮮明，使他們勇於消除民族屈辱，並把「外族」的文化遺跡一一清除。

耶穌會在東方的傳教工作

在十六世紀最後數十年，幸好我們可以欣賞到活潑的中國教會萌芽，充滿憂慮和喜樂，展望未來充滿信德和希望。當時新成立的耶穌會開始到東方傳教，會祖依納爵·羅耀拉派遣會士方濟各·沙勿略到東方，他在一五四一年離家前往印度傳教，成為「好望角以東的所有土地的羅馬教宗代表」。他在果阿和印度南部海岸沿線負起使徒工作幾年後，他轉往馬六甲海峽和在一五四八

年到了日本，他在那裡等了三年，透過他所皈依的一位基督徒為助手，但仍致力學習那些非常困難的當地語言，藉此熱心傳揚基督信仰。沙勿略留居日本時才明白到中國文化所擁有的核心位置，所以他決定不惜一切代價進入中華帝國。這位來自西班牙的偉大福傳者（在一六二二年獲列入聖品）的夢想沒有真正實現：他死於中國沿海的小島上川島，在寒冷的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安息在中國土地上。他逝世那年，正好是利瑪竇在意大利馬切拉塔誕生的同一年，天主的恩寵要使在華傳教這一夢想成真，在三十年後他到達中國。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繼承了沙勿略的遺志，獲耶穌會任命為印度傳教區視察員，切實執行傳教工作，以智慧和慈愛克服種種波折。當時航海和貿易都受葡萄牙壟斷，主權使葡國取得保教權，因而控制傳教區甚至有權任命主教。澳門成為與中華帝國唯一有接觸的地方，當時已有葡萄牙人經商。范禮安相信不用武力或者商賈，都可與中國接觸交流文化和友誼，有助進入深層的對話，以期這民族終會高興地接受基督教義。

他鼓勵當時在果阿的年輕利瑪竇，要盡一切努力學習中文和中國話。在一五八三年，利瑪竇與同伴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e）獲得廣東總督批准在肇慶居住。起初，利瑪竇神父剃頭身穿佛僧長袍，但隨後看到這裝束沒有帶來特別效果，他便轉以儒家學者身份和打扮與人接觸，深入研究中國歷史和古代哲人的智慧。利瑪竇發現偉大的孔子留給後世哲理，他想藉儒家思想把福音訊息帶給中國人。他藉著與中國文人和官員彼此尊重和友誼，而在不同的城市住過。他以頑強意志，努力克服困難要往京城接觸皇帝。在一六零一年初，他獲准在京城居住，他向皇帝送贈重要禮物，突顯從西方來的學人風範，希望讓自己的所長貢獻中華帝國。

利瑪竇起初吸引中國知識分子注意力的，是他在肇慶時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顯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他的超乎常人的記符能力，使他培養出融入本地文化的技巧，受到很多人欽佩。利瑪竇重視著作和出版，是他在中國的使徒工作的優先工作。在一五九二年，他完成著作《交友論》，有一百多句格言，包括一些從拉丁經典中取出的句子，得到很多人讚賞，文章重印多次。利瑪竇撰寫有關耶穌會和基督信仰進入中國的書籍，解釋中文由中國遠古的祖先流傳下來，明認在至高有上帝或天。他喜歡把天主教教義寫成《天主實義》。他研究中

國人祭祖和敬禮孔子的傳統，認為這些祭祀不是敬拜一個神，無需誦念祈禱文或者祈求恩寵。

在一六零八年，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約有二十人，他們在多個城市開設了四個傳教所，有教友約二千人，其中三百人在北京。利瑪竇對領洗非常嚴格，皈依者包括宮廷官員、侍女及王族。利瑪竇的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合作夥伴是科學家徐光啓，在朝廷中有要職，被認為是在他家鄉上海開教的信徒。利瑪竇努力工作，最後因為勞累而在一六一零年五月十一日病逝，終年五十八歲。萬曆皇帝批准他葬在靠近紫禁城城門一處墓園。

利瑪竇很清楚傳教使命，必須特別關顧有聖召的年輕中國信徒，以培養他們宗教知識和度神職人員的生活。利瑪竇到達中國初期，已經關心準備聖召候選人，首批修士在一五九三年初發願。由利瑪竇和他的伙伴一起培養的有十五位修士，他們以熱忱培育慕道者，鞏固初期的信仰團體。對於有人提議一些可能有資格收錄為神職人員，利瑪竇感到似乎為時過早。他和其他會士感到先要發展文人信徒之間的聚會，成為早期中國天主教徒的團體，分佈在北京和其他福傳的城市，向個別人士提供具體培訓，加深使徒和愛德服務。北京團體的成員

負責幫助其他教友，特別是不懂如何為至親舉行基督徒喪禮，因為這考慮到中國人本性敬重亡者，以免他們在禮儀中加入迷信成份。團體中，幸好得到上主默感，成立為女士而設的聖瑪利亞天主之母和天神之后的團體，否則，傳教士沒有其他場合可以協助她們。

利瑪竇以配合儒學傳統來傳播基督信仰，這方式不是所有在華的耶穌會士都認同。長上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o）派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到羅馬，向教宗保祿五世就中國的傳教工作申辯，他得到教宗的三項特准：以中文文言體裁翻譯《聖經》；將來的司鐸不需要懂拉丁文；他們可用中文舉行彌撒、念日課和施行聖事（然而，這些重要的讓步似乎從未得到真正落實）。金尼閣返回中國時，根據利瑪竇的請求帶了千套科學和宗教書籍，並有兩位天文學家鄧玉函（Johannes Terrenz）及湯若望（Adam Schall）同行來華。

在利瑪竇辭世二十年後，中國基督徒兩度受迫害（一六一四至一六一七年及一六二三年），他們遭太監陰謀加害。當徐光啓成為欽天監，邀請耶穌會士合作修曆。儘管明朝末年形勢緊張（一六四四年），耶穌會士學者受到清朝王室保護。湯若望被委任欽天監監正職，

他得到滿族王室的信任，後來成爲康熙皇帝的老師。不過，在一六六七年，當年幼太子（時年十四）登基時，新一輪反對基督徒的迫害亦打擊湯若望。不過，兩年之後，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得到朝廷任命承襲湯若望之前的職務。

教會轉入地下

隨著時間的過去，保教特權逐漸變成了傳教工作的障礙。在一六二二年，教宗額我略十五世在教廷創立「傳信部」，負責指導及協調福傳工作。羅馬克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控制局面，又鼓勵法國根據特定傳教修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基礎，開闢更多傳教工作，依據傳信部在一六五九年發出的重要指令行事。

然而，此時發生了中國禮儀之爭。我們在此強調，這危機影響在中國傳教工作，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教宗格肋曼十四世解散耶穌會（一七七三年）。一七四二年，教宗本篤十四世頒佈宗座詔令，自此永遠地禁止天主教徒參與傳統的禮儀。隨著天主教傳教士受到迫害，無論在北京或在其他城市的中國知識份子當中，要求受洗的人亦隨之減少。洛朗坦寫道：「耶穌會士的中國熱忱，

滋長很多中國聖召，但禮儀之爭卻使它乾枯。超過一百多位法國傳教士（來自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一六六零年至該世紀末到中國。在一六九三年至一七四二年間，只有十二人出發，其中六人不適返國。這位作者引述歷史學家基納（Guennou）：「禮儀問題窒礙中國人皈依，也分散了法國神父培育中國神職人員的注意力。」

中國開始了一個殉道者時期，教會能夠秘密生存，多虧當時的樸實教友的勇氣及信德，他們大多數在農村生活。有些道明會士在沿海的福建省被處決。但是，受洗的中國人持續增加，以江南為例，他們在半個世紀內，由約一萬七千人增加至三萬三千人；而在十八世紀初，在四川，原本只有幾百名從外地移入的天主教徒，一百年後，已有四萬名受洗者。一八零三年，宗座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徐德新主教（J.G. Dufresse）為四川召開教區會議，有十四位神父參加，除了一位之外，全部都是中國人。在那世紀初期，政府發出新的迫害法令（一八零五年和一八一一年），針對外國傳教士及皈依的中國信徒。徐主教被長期監禁和受酷刑，在一八一五年被斬首。一個中國士兵欣賞他的堅毅精神，要求領洗，後來更成為神父，最後殉道。

具爭議的「傳教大世紀」

在西方，十九世紀工業時代開始，各國擴張殖民主義，以民族優越自居及使用武力強加文明於「異教徒」的地方。對於中國，西方國家認為有商業利益，而中國似乎落後沉寂，他們感到佔上風。大英帝國當時已經立足亞洲，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次大陸入口鴉片然後在中國分銷圖利，儘管中國政府禁止鴉片進口。在一八四二年，英國為武裝衝突在廣州找藉口，強迫開放港口及割讓香港為殖民地。其他西方列強也利用機會。法國聲稱為保護傳教士的權利要求更多利益，馬賴神父（Auguste Chapdelaine）在廣西被殺（一八五六年）成為宣戰理由，法國輕易地獲勝，腐敗的清廷只好簽署條約，包括取消對基督徒的限制，並加入許多有利於傳教士的條款，包括容許傳教士購買或租用房地產。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可說是深受「鴉片戰爭」及「不平等條約」的烙印，中國人心深受打擊。因此不難理解，人們對基督宗教普遍存有負面看法，這尤以知識份子為甚。他們指控教會利用先進武器和西方國家的利益來鞏固和擴大教會在華活動。但也有鮮明的例外者，包括創建太平天國（一八五三年）的洪秀全，以及

獲大多數推許為中華民國（一九一一年）締建者的孫逸仙（孫中山），他們都皈依了基督教。

義和團事件於一九零零年爆發，是敵視基督宗教的最高峰；義和團本來受惠於人們普遍對清廷的庸愚不滿而日益壯大，但結果卻受清廷慈禧太后的操縱，而變成針對西方帝國主義與基督徒的尖兵，估計當時有三萬名基督徒被殺害。他們當中很多人可說是真正捍衛信仰的殉道者。

在不平凡的二十世紀；伴隨著皇朝倒下所隨之而來的混亂之餘，中國第一個共和國誕生，亦帶出隨後數十年的軍閥混戰中原。然而，為基督宗教的圈子（包括天主教及新教）而言，自民國成立直至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一九四九年）為止，這個時期可視為「偉大的傳教士世紀」，而中國繼續是偉大的「傳教士實驗室」。畢拓里尼（Giuseppe Butturini）指出，在這一百五十年的傳教時期，約有三萬名分屬五十多個修會團體的男女信徒曾經來華傳教，有多方面的貢獻及積極成果。

然而，重拾早期耶穌會傳教士的偉大傳統實在並不容易。對在殖民主義陰影下發展的傳教事業，重新審視，實在大有必要。教廷得承認它未能成功擺脫法國保

教權的牽制來與北京朝廷建立關係。問題之所以十分困難，亦由於有些傳教士個人方面雖然沒有介入政治事務，但似乎以善盡傳教目的為理由，傾向於接受他們垂手可得的特權，因而難免顯得有點國家主義。中國大眾仍然對於基督宗教不信任或者存有敵意，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中國學生批評儒家傳統方法而希望學習西方技術和組織模式，他們同時反對基督宗教。兩年後，當美國基督教運動（世界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宣布擬在北京舉行新一屆世界大會，卻招致全國各地青年示威抗議。

即使在天主教徒中，也有不少人對來華外國人的傲慢感到不滿，著名知識分子馬相伯（一八四零至一九三九年）即為一例，他脫離耶穌會和司鐸生涯。西方傳教士中也有開明份子，挑戰眼前的福傳方法，並要求作出大幅度的更新；以比利時籍的雷鳴遠（Vincent Lebbe）神父為例，他推動公教進行會，及成立了首個中國基督徒修道團體「耀漢小兄弟會」。我們宗座外方傳教會總會長保祿·曼納神父（Paolo Manna）也在此時探訪中國多個傳教地方，認為有必要報告教廷他在中國發現到的偏差行為。不過，我們得痛苦地承認，教宗本篤十五世

頒布的《夫至大》通諭（一九一九年）當中要求培養本籍傳教人員及推行本地化的訓示，並未在中國獲得熱烈的回應。第一位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Costantini）由教宗比約十一世在一九二二年派遣來華，他迫切渴望促使本地主教管理中國教會，但要說服主要修會合作，則並不容易。

在一九三零年代，蔣介石委員長嘗試在國民黨發揚中國文化道統，以期阻止共產黨奪取政權。他個人則加入基督宗教，這似乎為傳播福音開闢了有利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期間中國與西歐列強聯手，打敗日本侵略者。但隨後出現的綿長內戰，卻是由紅色解放軍獲勝，而最終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宣佈成立。

這種種結果，都使得教廷對中國教會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在一九四六年成立聖統制，以及給予中國聖言會會士田耕莘主教成為亞洲首位領受樞機尊位者的重要措施，在歷史洪流的衝擊下顯得無甚作用。

就中國福傳事業歷史總結，不能忽略基督教各個差會傳教士的努力，他們在十九世紀初才來到中國傳教。在這些過去二百年間，他們一直非常活躍，即使在今天

的新中國，他們也享有盛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佈新政權的成立，其於六十年來的宗教政策，亦值得作一特別的分析。我們將有機會探討當中一些特別的事件，起碼勾劃出導致當前危機的種種背景。

從西方角度而言，從福音角度重讀新中國的歷史是值得探討的事。記得那年我曾參加巴斯塔德會議(瑞典)及隨後的魯汶國際會議(比利時)，世界信義宗聯會在兩個會議上都擔當十分積極的角度。當時中國仍然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西方不少人對中國充滿意識形態迷思，甚至有神學家視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新梅瑟」(註十四)。後來中共當局自己也譴責文化大革命的極端意識形態以及背後帶來的暴行。

過去經驗的啓發

首先，簡略地看中國歷史，宗教現實內存在政治權力的介入，這似乎早已植根在中國的傳統內。在中國歷代王朝，都有一個禮部負責祭祀，使天子行使對宗教的行政控制，確立主導地位。這純粹是專制主義，個人無論在公共和私人生活方面的宗教願望，屬於國家所有。

人們深信這種做法令到宗教能確保社會平衡，是自古以來天人和諧的重要元素。這種情況與早期基督徒生活在羅馬帝國相比，直到皇帝君士坦丁的皈依之前，政治當局無法容忍有一個獨立的精神權威存在於其範圍。換言之，政權當局不接受人民有雙屬歸順。

可能中國至高權力當局，很難接受在宗教事務上出現與皇權不一樣看法的獨立主張，因而促使耶穌會巡閱使范禮安與利瑪竇要制定轉化政府權貴的策略。同樣，聖保祿宗徒也曾想到要找一些通往古希臘的路，與精英同坐在阿勒約帕哥交談。

《給萬民》期刊編輯馬里·門納（Mario Menin）在他的文章介紹「中國與基督宗教」主題時寫道：「中國基督宗教歷史引人入勝之處，是教會在一再失敗之後，仍堅持建立持久的團體」，這在過往幾個世紀尤為如此。他指出這些「失敗」，其實反映出教會內部各種缺失和錯誤，由未有足夠準備進入中國文化和社會，以至傳教士常使人聯想到與殖民權力的密切關係，以及不願讓中國神職人員管理地方教會等。」（《給萬民》，第3頁）瞭解在傳統中國帝國歷史背景的中國教會最近所面對的困難，不一定能消除我們目前的種種憂慮，但至

少不會使人過份緊張對待這些問題。

中國福傳史給人第一個感覺是見證謙卑的偉大。幾年前，我在介紹 *La Cina di Mao processa la Chiesa* 書時，憶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二千禧年，提醒全球教會反思歷史，看看自己的教會是否按著「福音的恆常價值」生活，並嚴謹地「淨化記憶」。在面對中國教會眾多事件，也得省察良心，承認有時為求某些積極成果，多麼容易偏離「福音的恆常價值」。另一方面，反思中國天主教這個少數社群所處的境況，往往是困難重重以致悲壯感人的，我們其實可以為教會的將來制訂一幅路線圖。我們清楚知道，未來是充滿很多難以預見的事物，而人們所作的決定又經常繫於人性弱點。但無論如何，下一章會帶出一些可行建議，作為參考。

註釋

註一：鐘鳴旦,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635-1800*,

Brill, Leiden 2001. 清楚列舉每一個階段的源流、人物、場景和主題；所有相關的中文資料都有收集，圍繞宣佈和傳播基督信仰為核心主題，可以平行比對。

註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值得一提的是
Columba Cary-Elwes, *China and the Cross: A survey of
Missionary History*, New York 1957.

註三：羅倫: *Cina e Cristianesimo al di là delle occasioni
mancate*, Città Nuova, Roma 1981. 杜小安, *La Chiesa
e la Cina*, Jaca Book, Milano 2008. 沙百里的書,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Paris 1992, had a new edition in
2002, a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onsiderable
additions) in San Francisco in 2007: *Christians in China
A.D. 500 to 2000*.

註四：參閱《給萬民》期刊，他的文章：“La ‘via monastica’ al
Cristianesimo cinese”，第 9-22 頁。參閱：M.
Nicolini-Zani, *La via radiosa per l’oriente. I testi e la
storia del primo incontro del cristianesimo con il mondo
culturale e religioso cinese (secoli VII-IX)*. Qiqajon,
Magnano 2006.

註五：那次漫長艱辛旅程的描述，是他在一三三一年逝世前
不久口述的。那段經歷，後來由 Pordenone 總商會於一
九八二年以精細的凸版複製，以拉丁和意大利文出版；
然後，在一九八六年再版，加入評論與筆記(L. Monaco,

G.C. Testa 編輯) : *Odorichus-De Rebus Incognitis*.

註六：這方面研究，參閱 Umberto Bresciani 的文章, “Come i Confuciani vedono il Cristianesimo”, 刊於《給萬民》期刊，第 85–92 頁. Bresciani is the author of an important study on new-Confucianism: *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he New Confucian Movement*, Ricci Institute, Taipei 2001; it has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La filosofia cinese nel ventesimo secolo. I nuovi confuciani*,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Roma 2009.

註七：瀋陽（遼寧）一位神父，自從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羅馬任教，他的博士論文“L’azione apostolica di Matteo Ricci vista da un cinese” 研究利瑪竇的牧民工作。

註八：關於利瑪竇的生平和著作，很多學者發表研究報告，尤其在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紀念會上，他的著作在馬切拉塔 *Quodlibet* 刊物發表。

註九：湯若望享有崇高地位，惹來很多敵視和批評，導致其入罪、被判刑及最終死刑，在最後關頭才得到緩刑。他卒於一六六六年。兩年後，年輕的康熙皇帝為他平反。

註十：在巴黎外方傳教會最初的三百五十年（這有別於傳統修會要矢發永願），派出超過四千二百位傳教神父到亞

洲和北美洲，作為其主要承諾，幫助適應當地的風俗和培育本地神職人員。

註十一：他的文章“Chiesa cattolica e mondo cinese. Nel 'Grande Secolo Missionario' 1842-1949”, published in A.G., pp. 49-68.

註十二：請參閱柯毅霖, “Il Seminario Romano nello Shaanxi meridionale”, in: Agostino Giovagnoli and Elisa Giunipero (edited by), Chiesa Cattolica e mondo cinese. Tra colonialismo ed evangelizzazione (1840-1911), Roma 2005.

註十三：請參閱 G. Butturini – G. Colzani, Illuminata passione. Il beato padre Paolo Manna nella storia della missione contemporanea, EMI, Bologna 2001.

註十四：請參閱梁作祿（編），Esperienza cinese e fede cristiana, EMI, Bologna 1976.

註十五：梁作祿, La Cina di Mao processa la Chiesa – I missionari del Pime nel Henan 1938-1954, EMI, Bologna 2008, p. 14.

第三章 當前危機如何形成

在二零零九年，中共隆重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就算不滿意政府施政的人民，也會對國家懷有一份自豪感。假設今天可以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廣泛的意見調查，瞭解一下這十三億人口對於六十年來的生活之評價，相信得出的結果將會頗為正面。（註一）

國家賴以維持團結的愛國主義

我相信，大多數當地人民都會認同「這個中國」在多方面已擠身世界強國之列。然而，國內動輒有上萬的農民帶著強烈怨氣憤懣上訪，投訴經濟起飛而造就貪得無厭的暴發戶企業家和腐敗官員；但他們依然會支持國家，滿意今天的生活比往昔艱難歲月來得進步安穩。

另一類公民原則上支持政權但卻持保留態度，尤其是眼見腐敗猖獗、剝削人權公義的官員為利益無視法紀。就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例，中國民間對他獲獎普遍沉默甚至從未聽聞此事，亦未知悉他所寫的《零八憲章》，儘管西方媒體形容這位維權人士為挑戰中共政權的最著名抗爭者，中國群眾對他所知不多。

至於只佔全國人口中少數的中國宗教信徒（在這宣稱無神論的國家，宗教信徒可能有幾億人），他們對這控制國家六十年的政府也持不同意見。不過，中共當局意識到要提倡一些人民最能欣賞中國的特質，包括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不難理解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至十八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文化發展道路」成為主題之一。會議結束的聲明稱，中國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產業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並提高自己的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宗教有望成為「文化產業」的合作夥伴，基督宗教當然有條件成為首選。聲明發表之後，中國天主教徒可從中國主教團轄下的神學研究委員會迅即在北京召開的研討會（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感受到這官方的意識形態的

份量；研討會主題為教會本地化，會議認為「中國教會的本地化神學研究必須紮根在信仰的基礎上，尊重中國文化，為神學研究創造有利條件」。這個原本是典型的神學反省會議，但是「一會一團」的會議總要有中共統一戰線部和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無神論官員參加。（《鼎》，2012年，第164期，英文第60-61頁）結果，一次可以是純神學會議，又變得毫無意義。

本章探討的範圍，不是研究過往宗教政策有那些文化要素。根據中國天主教會的經驗，我們看到中共統治的首三十年，以毛澤東的革命野心支配一切。即使鄧小平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並以「四個現代化」面向世界（一九八零年），在中國社會中的「指導」宗教現象的結構框架，早於毛主席領導的時代已經存在。（註二）鄧小平的劃時代改革，帶動整個中國社會前進；至於宗教信仰徒，他們緩慢地恢復元氣、甦醒過來。曾經被判刑往勞改營的基督徒陸續回來重整教會，被關閉和毀壞的教堂獲得歸還及重新開放。

在這個嶄新階段，中國政府在一九八二年修訂《憲法》，成為關鍵時刻。雖然《憲法》容許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條），卻被著名的宗教「十九號文件」《關於

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制衡著。中共中央委員會對於宗教現象，保持從文化角度來看宗教問題。這點值得探討，因為這份文件至今仍然是中共主要的宗教參考指南。（註三）

目前，我想指出，不少基督徒爲了保持信仰完整無損而面對困境；雖然他們生活在共產主義國家之中，但是因應國家近幾十年變化，也巧逢機遇。（註四）現在嘗試闡釋中國基督徒近年如何在既定規則和複雜官僚架構之中發展開來，有助反省中國教會的前景。

今日中國大陸基督徒的生活面貌

每當有人問及中國大陸基督徒的統計數字時，差距懸殊的數據總叫人沮喪。歸根究底，因爲至今沒有可靠的中國官方數字。在二零一二年初，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的《鼎》季刊，發表了一些中國天主教會的數字（《鼎》，第 164 期，中文第 52 頁），估計大約有一千二百萬天主教徒，分佈在一百一十六個教區（有神職人員服務），有一百零七位主教（其中三十八位不獲政府當局承認）。神父方面，老一輩的逐漸離世：二零一一年，約有六十位倖存的高齡神父。今天，估計有三千二百名神

父，其中一千三百人屬於地下團體；有五百六十名大修生，分別在十間認可的大修院讀書；也約有三百五十名修生（自二零一一年人數已經減少）在十六處地下修院讀書。有五千名修女，頗為年輕，屬於教區修會（約三分之一在不獲政府承認的團體）；有六十間初學院（其中二十所屬於地下）在培訓新的聖召。全國大約有六千所天主教教堂和小堂，但地下團體在不獲政府承認的地方舉行禮儀和祈禱。

同一期的《鼎》報導了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按馬英林報告的數字，過去六年的牧靈和傳教成果：超過四千七百人接受了靈修培育，一千八百人參加傳道員課程，二萬多名教友參加教理講授課程，二千二百餘人參加夏令營，約五千名堂區領袖接受培訓，超過一萬人參加了禮儀課程。有為慕道者舉行了六百一十六個慕道班，共十萬餘人領洗。據該報導，官方天主教會信徒人數為六百萬。

設於河北省石家莊的「信德文化研究所」，二零一零年底公布統計結果，有三千名神父在公開教會團體，男修會成員有三百五十人；修生估計有六百人，分別在十間大修院培訓，而有四百人在二十間小修院。信德研

究所之前的報告稱，天主教會營辦二百二十間診所、十一間醫院、八十一間老人院、四十四間幼兒園、兩間專業中心、二十二間孤兒院或殘疾兒童中心、三十四間其他社會服務中心，並指出約八十位修女，在政府開辦的癲瘋病人院舍服務。

無論如何，各類數據存在差異，因為接近中國政府的來源，不計算不屬於公開教會組織的天主教徒，指稱他們是非法或「地下」，而他們不獲政府承認的。

至於基督新教（註五）方面，數字差距更大。美國福音派估計，基督教徒人數有七千萬至一億，而中國半官方刊物，把數字定為約一千五百萬人。（註六）

近幾十年的社會新景氣，對於信徒有實際影響。例如：上述的神父和修女聖召，眾所周知，在五十年代中期，所有修院被關閉及所有女修會要解散。政府依然禁止宗教界「干預」教育和社會範疇，但近幾十年來實行時卻一直盡量寬鬆包容，尤其是在貧困地區，政府所做的服務不多：在一些城市，教會可以開設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在石家莊的「河北進德公益」近年獲政府批准為基金會）；與地方當局建立友好和合作關係，有助獲准開辦培訓傳道員課程或者福傳研討會。在近年，有教

區為慶祝「司鐸年」而舉行公開活動。由於中國對外逐步開放，眾多修生、神父和修女到國外學習，從而取得學歷或資格，回國後在修院教學。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現代科技網絡設立了強力攔截的「防火牆」，限制和控制宗教訊息傳播。不過，隨著時代發展，互聯網也給宗教創建更顯著的空間。教會藉此發展個別人士或團體主辦的新活動項目，與網友分享宗教訊息或牧靈活動。

出版方面，宗教群體仍未有自由在公共書店售賣其書刊。大陸天主教會主要有三間出版社（北京、上海和石家莊），縱使他們必須提交書刊予官方部門審查，但也為全國天主教團體提供一些教會書刊。在傳揚《聖經》方面，天主教與基督教所做的相差很遠。在二零零九年，泰澤團體獲准在大陸教會派送一百萬冊中文《聖經》。由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由真福雷永明 **Gabriel Allegra** 創辦）翻譯的思高版《聖經》，獲得中國當局批准可以在大陸境內流傳，目前還有澳門樂仁出版社編印的《牧靈聖經》也可以在國內通用。不過，宗教書籍不能在公眾的書店發售；但今天已有學者，當中有非基督徒（或「文化基督徒」）深入研究宗教題目或宗教書籍，透過文化交流或學術研究方式傳閱刊物和訊息。

基督徒團體如何成長

這些筆記雖然零碎，但相信有助讀者瞭解信仰基督的團體，如何冒著被滅絕之風險，仍然經得起這幾十年的考驗，在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發展開來。這種現象，也呈現在其他獲政府承認的宗教（道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興教派，據在廣闊的「灰色地帶」中，而它們往往有被歸納於迷信邪門之說的危險。根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兩位教授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在英文《中國日報》發表。他們說，約有三億中國人聲稱他們信奉某些宗教，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十一以上。這引證了由鄧小平提出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實踐唯物主義不能滿足人的心靈需要。事實上，有些以發展為名的特權領域，如浙江省，基督徒企業家勇於公開以福音的價值，積極成為履行社會責任的承擔者。（註七）據前英國首相貝里雅（Tony Blair）說：「要意識到宗教是一種社會資產，有助於培養公民之間的凝聚力，提供社會道德規範，尤其是承擔大量經濟移民影響的社會，以及要治療那些受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影響的地區，包括中國當局。」（註八）

即使在今天的「新中國」，宗教信徒的生活，尤其

是基督徒方面，仍然充滿障礙，這本來不是什麼令人詫異的事，因為管治的政權是無神論者。香港的新聞從業員秦家聰指出，為基督徒來說，它是明顯的，我們必須「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中國共產黨似乎想享有特權，既要屬於凱撒又屬於天主的東西。（《南華早報》2010年12月29日）如前所說，中國在宗教方面的持久政治路線，一直由《十九號文件》作思想指導。

這文件結尾已證實宗教迫害只會幫倒忙，改為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主張宗教將會於社會主義在社會上全面實現時自行消亡。文件也確認有需要控制宗教，以便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背景，讓宗教對國家的發展計劃作出貢獻。這種意識形態的方式，也落實在《宗教事務條例》中。該《條例》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生效，由國務委員會批准實行。

中國當局引用傳統路線時有時會稍為軟化，尤其在「為了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好使宗教實踐能夠促進社會福祉。這使中國共產黨在二零零七年舉行的「十七大」，第一次把「信教群眾」納入《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第十九段，要團結他們「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隨後，黨中央政治局用了一次全體會議探討這

個問題，而主席胡錦濤本身，更加建議要注重宗教的積極作用，在建設「和諧社會」(這是他經常引用的口號)。不過，嚴苛的鎮壓宗教信徒仍然存在，尤其是針對維護公民、宗教權利以至反腐敗的個別人士或運動。

一直以來，選任和祝聖主教問題是障礙中國天主教團體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這方面，中國教會目前正處於微妙時刻，在二零零六至二零一二的六年間，先後有二十五位年邁主教安息，他們的平均年齡為九十歲；而老一輩的神職人員(在一九四零年代末和一九五零年代初晉鐸)相繼逝世，使問題更複雜。主教的接班人，唯有從四十餘歲的神父中揀選出來，以接掌教區，帶領教會邁向未來，至少三十多年的光景。

本書的第一章強調在二零一零年底突然出現了危機。在二零零七年，有七位新主教祝聖，其中五人似乎可以與政府當局達成協議。之後兩年，卻沒有主教祝聖。在二零一零年首九個月，有不下於十位的主教晉牧，全部都得到教廷批准和獲得政府認可(其中一位早已晉牧但不為政府承認)。這驚人的發展引起中國內外的揣測，以為北京政府和教廷之間，不久將來可以達成協議。不幸地，隨之而來的多宗嚴重違反根本原則的事

情，觸及非常深層次的問題，難以找到解決方案，事實確是這樣。

政府宗教政策的底蘊

我們要先指出，中國政權策劃的操作工具，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應用到具體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複雜，卻顯示它是有效率的。從一九五零年代初，政府成立了一個宗教事務部門，在官僚架構的各級設立辦公室，逐漸正名為今天的「國家宗教事務局」。在政治層面，共產黨委派統一戰線部專門處理宗教問題，連同社會上不奉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其他群體一起處理。從一開始，中共已經宣稱有宗教信仰自由，以蘇聯的模式為基礎；不過，同時間，領導人確認有實際控制五個官方承認的宗教，又在每個宗教設立一個類似愛國會的組織，作為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紐帶。

在五個宗教之中，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最遲成立的，因為當時多個教區的代表反抗，又對「革命同志」的承諾表示不信任。在一九五七年夏天，特別召開了一個天主教代表會議，在漫長會議期間達成妥協：在總結聲明（八月二日通過）稱，中國教會「同梵蒂岡教廷保

持純宗教的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必須徹底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梵蒂岡教廷的關係。」翌日，官方《人民日報》報導該消息，指控「右翼分子存在於教會內」損害祖國利益。這反映一次新的嚴重政治危機：兩個月來，毛澤東否認「百花齊放」的擴張階段與他有關係，在全國各地掀起追捕「右翼分子」行動，無數卓越人士成爲受害者，包括黨內有地位人士。（《人民日報》，1957年8月3日）

之後的幾個月，一些地方天主教團體在飽受壓力下，首次投票「自行」選舉主教，又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在漢口（武漢）爲董光清和袁文華兩位方濟會士舉行主教祝聖禮。兩人爲人正直和對教會忠誠。當時，他們能夠拍發電報到羅馬的教廷傳信部以及他們的總會長。他們在電報中解釋選舉如何進行，並要求教宗批准。不過，傳信部部長的回覆是一個負面答覆，基於聖部辦公室發出一項法令，因應東歐發生急劇變化的形勢。（註九）那封來自羅馬的答覆，從司法角度來看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此舉擴大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決裂，而中共正在激進改革，因爲毛澤東積極動員進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通知羅馬的主教選舉和祝聖禮陸續進行。在一九六零年，恰逢上海審訊龔品梅主教(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中國新聞媒體以更加激進的言詞反對羅馬。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國天主教第二次代表會議召開，在閉幕聲明稱，「堅決擺脫羅馬教廷的控制」和「徹底實現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任務」。會議結束後，七位新的主教進行「自聖」，使非法祝聖主教的人數增加到四十八位。(註十)

隨後，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悲劇，當局試圖完全消除宗教。直到毛澤東去世以後，大氣候才開始改變。一九八零年，愛國會起死回生，這天主教徒組織召開了第三次大會，在當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進行，有二百人參加。緊隨會議的是另一個為期三天的會議，參加者差不多完全一樣，以「天主教代表第三次會議」的名義召開，它決定了在愛國會以外，還多設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天主教第四次代表會議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第五次在一九九二年召開，通過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以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章程」。這些規章訂明，代表會議是中國天主教會的最高權威，還增加了重要的決

定，關於教會的運作，並通過由愛國會和主教團雙方領導人組成的「聯席會議」，從而確立愛國會在教會事務上的權力；至今天，官方採用「一會一團」，就是指這兩個組織。（註十一）其後，再有兩次天主教代表會議（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四年），分別選出北京教區傅鐵山主教為愛國會主席，以及南京教區劉元仁主教擔任主教團團長。兩人幾年前先後病逝。因此，原定要在某些時間舉行新的代表會議，但會議被推遲了好幾次，而觀察家、學者、甚至官員均未得悉政治路線如何適應中國社會情況，各方尚未掌握好。

中國一位非基督徒學者告訴我，他已經對所謂的「家庭教會」（基督教）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家庭教會」對沿海繁盛地區有著積極的影響。他的詳細報告呈送了中共高層辦公室，他們對事情作進一步調查，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召開了專家閉門會議。經過充分和自由的討論（並沒有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官員或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代表出席），與會學者們建議，「家庭教會」應該獲得國家組織承認，甚至北京的英文報紙亦對此有所報導。但是，很快清楚顯示，政策沒有改變過來。（註十二）事實上，最近「對華援助協

會」引述中國共產黨的機密文件，披露政府正在發動一個徹底剷除家庭教會的運動，要求家庭教會的牧師和信徒登記，以便在十年內完全清除非政府認可的教會團體（《亞洲新聞》，2012年4月27日）。天主教徒有理由相信，地下教會團體將面對同樣命運。

也許共產黨的領導層普遍憂慮，一旦放鬆管制，以傳播福音為名而未經當局批准的社會和政治活動會越來越多。對於天主教會，雖然不大可能會出現什麼爭議性的活動，但是政府官員也不想讓「地下」團體散播他們的活動。也有人提出，與梵蒂岡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也需要降級處理，以免有利於信仰轉化皈依。

在這種複雜的境況，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五旬節簽發了一封致中國教會的信函。（註十三）這份權威的文件，提供一個冷靜、客觀的分析，突出具體問題，以及中國教會必須面對的需要和優先事項。它還強調耶穌在教會訂立之主教職的重要地位；並譴責在中國，「在各種導致上述狀況的原因中，若干機構扮演著角色舉足輕重，他們被強加在天主教會團體之上」；事實上，「上述（由國家設立並與教會體制無關的）機構宣稱自己的宗旨為：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

教原則』，與教會道理也是無法調和的。」(第7號)。
這是教宗毫不猶豫的說明：「根據上面所述原則，目前在中國的『主教團』，宗座不能承認其為主教團：因為那些與教宗共融然尚未獲政府認可而被稱為『地下』的主教們，都不在其中。相反，卻有那些直至今日尚未合法的主教，且在規章內也含有與教會教義不相容的因素。」(第8號)。教宗的信函公佈後，沒有看到中國官方的評論，但信函的流傳卻遭抵制。其後，在羅馬和北京之間有新的接觸和各級會議，一般希望可以達成協議，但是結果並不明朗。

由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編製的第三份《中國宗教藍皮書》(二零一零年版)，包含一個基督宗教的部份。研究員王美秀在她對天主教的研究報告中，提及各教區推動的牧民倡議和舉辦的課程，並提供最近的統計數據。該報告停頓在對先前多次談及的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的籌備工作上。她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很少考慮到一九五七年通過的愛國會章程的承諾，以「服從教皇的信仰和教義的教導和必須遵守的規則。」她還指出，在實際層面上，在過去十年間，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已經形成更緊密的聯繫，並質疑天主教代表會議和其

他兩個組織，在今天是否仍然有必要存在。

另一方面，曾經擔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的葉小文，任期是由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他從不諱言要貫徹涉及教會的官方政策。目前，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研究所書記，職級相等於部長，他在宗教局的接班人是其副手王作安。王作安在多個場合強調了實施「三自」和「民主辦教」的重要性。

人們普遍相信，幾位國家領導層有意要懲治天主教會，當中包括那些負責共產黨宗教政策的統一戰線部官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表達這方面的意圖。副總理朱維群（前面已提到）在這事上比較突出，他曾說，要在教會內製造混亂，迫使不獲教宗承認的主教們命令其他人接受政府的安排。

突然倒退

在這些複雜的背景下，最近突然出現嚴重危機。前面已經提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郭金才神父在沒有教宗批准下，在承德接受祝聖為主教（承德位於河北省，距離北京約二百五十公里）。對於中國當局脅迫八位主教到場參加祝聖禮，各方非常關注。（註十四）

教廷譴責「這種由中國政府及公安部門施加的壓制，嚴重違反了宗教自由與良心自由。」聲明也「包括考慮此次主教祝聖的有效性」問題。不過，許多人都想知道雙方突然中斷對話的原因。

愛國會強烈要求召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八大），顯然意在拉開與教廷期望的距離。結果會議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在北京召開，其籌備過程及進行情況，都在顯示北京當局在向各方展示，抗拒中國政府對中國教會的政策是徒然的，儘管這些政策與國際天主教會的期望截然不同。北京這種挑釁行動，很可能與劉曉波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有關，要向奧斯陸及西方國家表示其不滿態度。劉曉波目前仍然被中共囚禁。

中國中央政府利用統一戰線部和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地方辦公室，確保「八大」有充分參與，不會出現有代表性人物缺席的情況。代表的名單，透過各種諮詢敲定，因此毫無疑問會動用警力配合，以迫使主教及代表們去北京參加會議。衡水教區（河北）約一百名警察和政府官員，與當地神父和教友對峙幾個小時；當天信眾一直在保護主教以免被帶走，直到晚上，官員強行帶走他們的主教到首都北京（《亞洲新聞》，2011年12月7

日)。代表們分批由教區所屬的省級或市級官員，提前幾天在各自的地方集合，「統一」他們的思想，堅持參與者要表達愛國家和愛教會的情緒，一致投票支持「一會一團」的提名候選人，以及全程參加整個大會。

在如此受監控的環境，三百多名天主教代表（官方的數字是三百一十三位，包括四十五位主教、一百五十八位神父、二十三位修女和八十七位教友），加上約一百名統戰部和宗教局官員，齊集北京友誼賓館出席會議。一切都如預先期待及安排的。每位代表有預定的座位，因此，陪同的官員可以清楚地觀察他們的舉動。（註十五）一個宗教性質的會議，要動用如此武力甚為可恥。一向都很諒解中國國情的比利時的韓德力（Jerome Heyndrickx）也說：「這件事震驚了國內以及海外的所有教友」。（《天美社》，2010年12月8日）大會的主要目的是選舉中國天主教兩個官方組織的最高職位，這些職位已經出缺多年。選舉在第三天進行。對於新領導人的選擇，只有一位官方候選人，完全沒有機會討論或提出另一候選人。投票必須一致通過，以舉手形式進行。一位主教說：「在整個會議中，我一直垂下頭，拒絕投票予政府提出的主教們，但他們依然計算了我的一

票……選舉結果是預先決定了的。……我們在場的主教、神父、修女或教友，根本沒有機會就這些官方候選人表達反對聲音。」(《十字架報》，2010年12月27日)

在這種情況下，非法祝聖的昆明教區馬英林主教被任命擔任主教團主席，與教宗共融的山東省臨沂教區房興耀主教則被選為愛國會主席。由於愛國會明確地「與天主教教義不相符」，此舉明顯的富有政治含義。一些評論家指出，這是「打了教廷一個巴掌」。教廷的回應在「八大」一個星期後的十二月十七日才發表，當時梵方已經確定「多位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都被迫去參加」大會；「譴責這種嚴重違反人權的做法，尤其違反他們信仰及良心的自由。」梵方的聲明表示：「對於那些以不同方式，勇敢地為信仰作證的人，聖座向他們致以最深的敬佩，」並懇請各方「不斷祈禱、做補贖，並透過他們的言行，重申他們願意懷著愛去跟隨基督，與普世教會保持圓滿共融。」北京政府當然反駁梵蒂岡的指責，認為梵方「不僅非常冒失，而且十分無理」，又指梵方在「接觸商談的同時，以公開和秘密方式干涉中國天主教內部事務，試圖重新控制中國天主教會。」

許多矛盾重新浮現

前面提及一位並非基督徒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研究員任延黎教授，他認為中國當局單方面的姿態不可理解的，中國和梵蒂岡進行了定期和積極的會談，「四年以來一直很順利」，沒有發生非法祝聖。他認為，近期「圍繞主教祝聖發生的事件破壞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氣氛，干擾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至於自選自聖主教的辯解，他說：「無論『主權論』還是『宗教自由論』都是蒼白無力、貽笑大方和不值一駁的。」（《天亞社》，2011年7月22日；《英文公教報》，2011年7月31日）

一位地下神父痛苦地評論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兩敗俱傷的鬧劇」。大部分與會的主教，包括一些非常受尊崇和忠於羅馬的，顯示北京成功地脅迫支配著神職人員。（《南華早報》，2010年12月10日）除了極少數罹患重病住院或高齡難於遠行的主教們之外，僅有一位中年主教能夠避開參加大會，事件引起了警方的猛烈追擊。（註十六）對於一直期望在國際舞台上居領導地位的新中國，這些事件算得上是聲譽上的勝利嗎？

這些事件令人遺憾，同時暴露了中國教會的錯綜複雜，以至他們的形象倒退。雖然境外的觀察家傾向同情

主教們，因為他們是政治權力機構使用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國內有聲音指出，「我們對他們是受害者的身分寄予了同情，那麼，他們破壞聖統制、傷害教會權益的完整和誤導教友的施害行爲，又該由誰來買單呢？」（《天亞社》，2010年12月29日）如果外界對這些參加者因爲是「被迫」而加以同情的話，請不要忘記，在惡劣環境裡，軟弱的受害者往往同時也是施害者。

問題是中國教會從現今如何發展下去？事實上，非法主教馬英林要提名新的牧者填補出缺的主教職位，這肯定不利於對話或者尋求雙方同意的解決方案。退出前線的平信徒劉柏年（許多人形容他爲中國「教宗」）仍然叫人關注，雖然他已經正式離開了前線職務，但是似乎仍在幕後掌握權力，他在「八大」取得一個新職務，當上「一會一團」兩位名譽主席之一。（註十七）

多位近年獲教廷批准的年輕中國主教，都是忠信於福音及牧靈上有承擔的一批，但他們卻沒有辦法聯同一起參與「八大」的神父和教友們，抵抗政治權力所強加於地方教會「民主原則」，事件確是令人擔憂。這些年輕牧者，面對勢力牢固及經驗豐富的管治階層時，他們本能上表現出有點畏懼，這倒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教會將有怎樣的前途呢？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有深入研究的沙百里神父指出，是否有一種「中國式的抗制教宗主義」在不知不覺間浸入了某些中國主教和神父的腦袋中。這思想主張限制教宗權力並要求各國天主教會自主的運動。他看到在中國的福傳事業的歷史上，在一個世紀前，有外國傳教士度非常好的奉獻生活，卻自以為比較優越，開始形成「一種文化，帶點唯我獨尊的愛國精神」。不過，他不認為有分裂到像英國教會那般的危險，作為共產主義中國，它不是要成為一個宗教國家，而且也沒有像亨利八世的人物要自視為「信仰的守護者」。（法文《亞洲教會通訊社》，第 545 期，2011 年 2 月 16 日）

教廷在二零零七年召開中國委員會會議，就中國教會問題向教宗提出意見；至今委員會仍然有很多問題要反思。首先，迫切的是鼓勵牧者和教友重新建立信任、重新找尋共同信仰的根、恢復邁向教會內部合一及與普世教會完全合一的艱苦道路。然後，需要考慮到底應否及如何恢復與中國政治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多個場合反覆提到，一如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中國天主教徒致力於為和諧及太平的社會成長

作出積極貢獻；他們不要求特權，作為一「小羊群」，他們需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和自由地實踐自己的信仰。

近年連串負面事件均突顯一個具體難題，涉及對話夥伴的問題，這裡所指的對話夥伴，包括持守不同立場而存在於黨的政治機構以及政府部門甚至最高層次的政府人士。（註十八）在這種新形勢下，北京和教廷之間的外交關係，已經不再是一個優先議題，儘管國際媒體在報導中國的宗教問題時繼續高調討論。多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地重複，它有誠意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一直堅持兩個條件：梵蒂岡撤銷在台北的外交代表，這關係自一九五零年代初維持至今；並放棄干涉中國內部事務。奇怪的是，雖然北京似乎易轉兩個條件的次序，把第一重點重新放置，從強行要愛國會召開「八大」的態度來看。這是在北京住了數年的意大利評論觀察家方濟·西斯齊的分析，他對中國的實況很瞭解。（註十九）

還有空間抱持希望嗎？

今日最大的問題似乎是如何演譯第二個條件，即是說，假如「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確實存在，則要捍衛國家聲望的警誡便順理成章地登場。羅馬教宗對地方天主

教會團體行使的權威，在世界各地不會被視為「干涉」，但很多中國領導人認為自己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一些評論員指出，中國教會的危機猶如古代封地引起戰爭。即使今天，在各種觸及中國政府和教廷雙方權益的問題中，再次出現的，首推選任主教問題。教區的地域劃分（目前《宗座年鑑》沿用的是一九四六年教廷訂立的版本）是另一重點，這個問題需要相互同意的協議。即使沒有外交關係，這兩問題都能夠協議解決，以促進發展一個「和諧社會」，這也是政府強烈的願望。

二零零九年在威尼斯馬爾谷神學院舉行的會議上，嘗試在理論層面上觸及上述的司法問題。「宗座法典條文解釋委員會」秘書長若望·依納爵·阿瑞德蒙席（Juan Ignacio Arrieta）發言，詳細而批判地檢視中國主教團及愛國會二零零三年修訂的《章程》。他總結說，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有可能利用教會法制度的彈性處理事務的機制，以便為該國（中國）建立一個獨特組織的制度，但那些元素必須符合神聖法律的要求。（註二十）

問題正好出於這些「神聖法律的要求」，而中國的從政者不懂或者不想理解這些要求。他們建立的組織一方面強調「愛國的及天主教的」，另一方面又壓制教會；

官方很容易利用愛國會達到他們的目的。由於有了愛國會的存在，官方可以說，從早期開始是天主教徒本身想要祝聖自己的主教而獨立於教廷以外。在愛國會影響之下，在三十多年前，中國主教團已成立，而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亦被正式定為中國教會的最高決策機構。

一些學者堅持相信，認為制度性的模糊是今日中國社會的特點；他們舉出一個例子，就是當從政者繼續宣稱在《憲法》序言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碰不得的；但現實的公民社會已經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於是，他們說，這也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展，會有適當的修訂引入兩份官方認可組織的《章程》，使他們符合天主教教義（幸好代表會議似乎尚未有制訂的規章）。

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這兩個《章程》的修訂本，但是現在評估其影響性似乎太早。官方《新華社》報導了國家宗教事務局一名發言人的長篇演說，當中提及這兩個《章程》。

（《中國日報》，2010年12月22日）當中方與梵蒂岡進行辯論時，指責梵方提出「不合理要求」，該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正視了我們的憂慮，而聲稱天主教代表會議「不涉及天主教教義問題，不違背天主教基本信仰」，

主教團「履行牧職使命」，「依據主耶穌基督對宗徒們的派遣和聖神賦予宗徒們的權力」。主教團章程希望「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與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保持共融」。這位代表說，中國《憲法》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因此，「不存在其他國家或外國組織承認與否的問題」，「確按照這一規定，中國各宗教包括天主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

然而，在今日的中國，尤其在地方層面，宗教政策似乎時常根據具體要求和利益來演譯和應用。因此，領導人不會猶豫使用脅迫、哄騙、各種迫害手段、提供經濟利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扶助宗教服務。香港有學者指出，「越來越多的款項，通過愛國會，轉交教區、修院和堂區，因此，那些跟政府不合作的地方教會，必然會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同時，與世界各地無異，接受金錢者意味著失去本身的獨立性。」（《英文公教報》之《神州橋樑》，2011年12月16日）

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團體被分裂。大多數信眾不讓自己因在所有教堂的入口處都掛有愛國會的牌子的事實所嚇倒。他們的信德幫助他們明認和跟隨他們的牧者，以滋養他們的基督徒信仰和生活，避免其他人干

擾。此外，還有一些團體抗議政府濫用權力，因而遠離那些他們認為妥協太多的聖堂和組織。在主教當中，有一些取得宗座任命與教宗共融，但又同時高調宣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但是，教會處於險境，因為這些牧者的形象軟弱，基於他們同時獲得教廷批准和政府認可，他們可能進一步妥協，使「地下」團體和「官方」團體之間的合一更困難，存在的鴻溝更深。

近年，教宗本篤十六世賦予一位華人司鐸一項重任，正好向著正確方向邁出一大步。他是來自香港慈幼會的韓大輝神父，獲任命為梵蒂岡的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在韓大輝晉牧後表示，他相信中國境外的「教會團體或教友可以協助促進雙方的溝通」，有助「中梵之間的對話、互相瞭解，甚至達成協議。」（《天亞社》，2011年2月22日）◆

註釋

註一：本章原載於前面提及的《給萬民》（*Ad Gentes*）期刊的專題文章，題為“*Le vicende cristiane della Nuova Cina*” (pp. 69-84)。

註二：關於這個階段的具體事件的著作很多，包括：R.C.

BUSH,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Abingdon Press, New York 1970. 同時，請參閱梁作祿，“Christians in China”，*Worldview*, New York, 1980, 6, pp.8-10. J.T. MYERS, *Enemies without Guns –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1.

註三：參閱梁作祿，《文革後的中國天主教會》，聖神研究中心，香港，1982年。關於《第19號文件》，參閱本人的評論文章“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ligion”，in *Missiology*, Chicago, XI, 1983, pp. 207-290; also “Church and Religion in China: How difficult the dialogue ?”，in *Atheism and Dialogue*, Vatican City, XXII, 1987, n.1, pp. 63-88.

註四：參閱梁作祿，《中國的宗教自由有進展嗎？》，《鼎》，2002年，第125期。另請參閱曾其光(G. POLITI), “Sfide e prospettive attuali della missione n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給萬民》期刊 第237-256頁。另一參考資料: *Cattolici in Cina*, San Paolo, Milano 2008 (edited by G. Fazzini, A.S. Lazzarotto).

註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通常被視為兩個宗教。

註六：參閱文章包括：「在中國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明顯比天主教多」，《國際商業時報》，2005年3月28日。其他專家亦提示某些數字，參閱柯毅霖，“Pechino nuova Antiochia?”，in *Mondo e Missione*, June-July 2005, pp. 73-75.

註七：參閱今天中國新崛起的基督徒群體，陳村富教授（浙江大學），《宗教研究》，2003年11月。該文的撮要本刊於意大利《亞洲新聞》期刊，2004年4月。

註八：《華盛頓郵報》，2010年8月1日。

註九：教宗比約十二世於1958年6月29日頒布《宗徒之長》通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當中教宗確認每一位基督徒有責任愛自己的國家及尊重法律，而且強調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目的是「領導天主教徒堅持及支持無神唯物論的原則」。

註十：關於這宗複雜事件，參閱 E. Giunipero 的詳細研究報告，*Chiesa cattolica e Cina comunista*，第189頁。

註十一：《中國天主教教區管理制度》，有82條，在2003年通過。內容訂明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委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聯席會議的架構，不是天主教法律。

註十二：參閱「宗教場所尋求合法性」文章，《環球時報》，

2009年4月11日，第12-13頁。根據加拿大記者麥嘉（A. McCabe），在首都北京及周邊地區，約有三千個基督教崇拜聚會點，設於租賃物業，它們得不到官方正式確認，但也不再受到警察滋擾。然而，在2010-11年度，警察幾度針對基督教守望教會（不獲官方認可），一些基督教會領袖結果發送一封公開信予中國人大常設委員會主席吳邦國，要求修改宗教法規。這一舉措似乎得不到什麼特殊效果。當局繼續施加壓力，使「家庭教會」接受成為官方架構的一部分，但他們試圖控制緊張局勢不致升級，不過有牧師似在挑戰這政權。參閱《華盛頓郵報》文章（2011年7月28日），在法文《亞洲新聞》轉載，2011年12月30日。

註十三：《羅馬觀察報》，2007年6月30日至7月1日。教宗信函可以在《梵蒂岡網站》下載，有多個語言版本 www.vatican.va/holy_father/benedict_XVI/letters/2007。

註十四：在2010年12月15日，滄州（河北）教區全體神父向政府發了信件《滄州教區全體神父上政府書》，指官員「以欺騙、軟禁等手段將我們教區主教強行『送去』承德參加祝聖活動是甚麼行爲？」，並質疑「憲法賦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在哪裡？」

註十五：多個媒體的報導，證實了護送或押送主教們時，住宿房間（有兩張床）必定有人從旁監視陪伴。

註十六：這位是在滄州（獻縣）教區李連貴主教。前述信件於 2010 年 12 月 15 日由他教區的神父們公開，指出李主教因承德非法祝聖而承受壓力，「至今未歸，下落不明。」還沒有回家，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再者，政府機構被指使用不能接受的措施，派出「公安警車公然包圍教區，如臨大敵！」信件質詢：「這是民主國家的特徵嗎？這是和諧社會的表現嗎？難道『文革』又回來了嗎？」同時參閱《亞洲新聞》，2010 年 12 月 7 日。

註十七：在德科隆納（Marco del Corona）訪問，《晚郵報》，2011 年 1 月 28 日。有人認為，劉柏年對房興耀主教（愛國會新主席）的影響力很大。兩人均來自山東省。

註十八：在 2011 年，總理溫家寶在國內外公開場合強調，有迫切性進行適當的結構性改革。不過，這些演說受官方《人民日報》有系統地抵制。該刊屬於中共宣傳部。

註十九：西斯齊寫道，梵蒂岡曾要求派代一名表到北京作為聯絡人，在雙方似乎已經達成選任主教的協議。然而，此時，北京政府與台灣的關係（尤其是商業）變得緊張。「北京與台灣總統馬英九有默契，不會進一步收緊台灣

的外交空間，要求梵蒂岡撤銷其外交關係。」教廷是二十八個小國中最重要，它仍然承認台灣，並有一定的國際關係意義，儘管它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成員。西斯齊寫道：「如果羅馬派代表到北京，就是在馬英九臉上打一耳光，這不是北京希望與台灣和平統一的政策，會是一大倒退。」（《亞洲時代在線》，2010年12月16日）

註二十：參見B.F. PIGHIN (care of), *Chiesa e Stato in Cina, dalle imprese di Costantini alle svolte attuali*, Faculty of Canon Law, Marcianum, Venezia 2010, p. 163. 在2011年6月6日，宗座委員會發出一份「《宗座法典條文解釋委員會》有關《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正確應用的聲明」，列明對參與非法祝聖的人可能會被絕罰。中文版見聖神研究中心網站www.hsstudyc.org.hk。

第四章 恢復對話之路崎嶇漫長

中國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建立了共和國，在二零一一年，海峽兩岸的政府都隆重地慶祝一百周年。(註一)北京政府藉此「雙十」慶節的機會與「叛離的省份」台灣的領導人展開對話，因為全體中國人民都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他帶領國民推翻封建帝制邁向民主。孫先生已受洗為基督徒，他受福音啓迪開始在中國推行社會現代化，正好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註二)

共和國革命經歷一世紀

在過去一百年，中國很多事都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佈成立的新中國息息相關，新的意識型態路線和社會目標逐漸發展開來。宗教價值方面，新中國制

訂了具體政策，宣布了公民有自由信奉或者不信奉宗教，但要「指導」國內五個官方認可的世界宗教，包括天主教，以跟隨社會主義路線發展。

中共建國後首三十年，宗教信徒經歷了一段非常坎坷的日子，而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情況有所改善。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帶領中國走向世界，有人試圖解決一些天主教特有問題，包括天主教徒堅持不會背棄與教宗的實質共融合一。教宗不僅是羅馬主教，也是有領土象徵意義的「梵蒂岡國」元首，確保他在行使普世使命時的獨立性和主權。（註三）在國際層面上，雖然教廷不是聯合國正規成員，但亦是觀察員國，得到聯合國及轄下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等）認可。

不過，新中國的領導人，自四十年代後期以來的冷戰氛圍之下，立時把「梵蒂岡」與其他西方國家劃清界線為國家敵人。所以從新中國開始，基督徒已經遭受磨難。最後，教宗關懷中國教會事務的權利，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挑戰，被指為「干預」中國內政。

矛盾的核心在於選擇和任命主教。根據天主教教義，選任主教必須羅馬主教（即教宗）的同意。迄今，

這個問題仍然非常棘手。在過去幾十年間，有就具體問題建立對話渠道。在二零一零年，緊張形勢似乎趨向緩和，在教廷和中國政府取得默契，有十位新的中國主教獲得選任。但到了年底，一個新危機浮現。中國當局決意祝聖郭金才為承德（屬河北省）主教，並召開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該代表大會被中國政治領導人視為中國天主教的最高權威。

我們陷於驚險的兩難局面。如果目前緊張局面達到臨界點，它將成為中國天主教會團體的致命傷。但同時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聲譽也會大受影響，因為教廷與一百七十九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我一直憂慮這些險境，故想建議或敢於提出一些見解，希望有助消弭誤會，彌合鴻溝。我認為鄧小平的銘言，從「實踐中檢定真理」是一盞指路明燈，富有啟發性。

處於教廷與政府夾縫的中國主教

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初期，天主教會被迫在未經教宗批准下選舉和任命新主教，以代替被逐離中國的歐洲牧者。當中國自我封閉不與世界接觸時，這些「獨立自主」選舉和祝聖多次發生。毛澤東死後，教宗保祿六世

面對一個危機，擔心中國教會可能從此消失，因此，他把已經授予東歐教會的一項特權，伸延至中國大陸的合法主教，讓他們秘密祝聖主教接班人。（註四）

在中國，有關教廷下放這特權的消息並未廣泛散佈。當時，適值河北省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出獄不久，他也擔憂地方教會小羊群的將來，他毫不猶疑於一九八一年開始祝聖了一些主教。當教廷獲悉有秘密祝聖禮後，就批准了那些新的主教。（註五）當然，這些秘密祝聖主教，不獲中國政府承認。另一方面，差不多同一時間，大部分曾經被迫接受非法祝聖的主教，各自以不同的渠道與教宗修和。這也是因著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教會有機會與外界人士接觸的結果。

天主教會視主教是宗徒繼承人，獲交託分享伯多祿在基督內照顧教會團體的責任。因此，一位天主教主教，為其地方團體來說，他只是一位宗教領袖；但在某些情況下，他的社會威望不容忽視。在教會歷史上，就算在歐洲天主教國家，也曾有政府圖謀舉薦屬意的候選人當主教，以便推行某些政策或得到某些利益，因而不時與教會發生衝突。

教會法定的《天主教教理》，融會了梵二會議（一

九六二至六五年)的議決以及源遠流長的天主教傳統，清楚列明下列幾點：「每個主教都在主教團的範圍內執行職務，與羅馬主教——聖伯多祿的繼位者和主教團的首領共融。」(第 877 號)再者，「今日，為合法地祝聖一位主教，需要羅馬主教的特殊參與，因為他是所有個別教會在唯一教會內共融之最高、有形可見的聯繫，同時，他又是它們自由的保證。」(第 1559 號)(註六)教宗在這方面的責任很清楚：「羅馬教宗，以基督代表及整個教會司牧的職務名義，對教會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權力，能時常自由地使用。」(第 882 號)

在現行的中國《憲法》(一九八二年通過)，對宗教自由很重要的第三十六條，它說：「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這也意味著沒有人可以被迫改變他或她的宗教信仰。不過，該條文最後一段稱：「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天主教徒在這一點上感到緩解，因為教宗的權威並不構成「外國勢力的支配」，而是他們的宗教信理的一部分。因此，當這一憲法條款被用以威迫他們選聖主教而不理會羅馬主教的決定時，他們感到背

叛信仰，似乎被迫改變自己的信仰。

在上一章提及的《宗教藍皮書》中，根據王美秀的研究，認為需要重新考慮中國教會的結構和羅馬之間的相互權利。無論如何，中國教會的主教團的適當任務，根據學者王美秀，必須與愛國會清晰區分開來，因為後者的設立，是擔任國家與教會之間的「橋樑」。

此外，「教會事務」和「民主辦教」等字詞的表述意義，必須按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有關處理這些方面的各種文件的決議來闡釋。這些建議，目的是為更順利地執行官方的宗教政策，以及使屬於少數社群的天主教徒，與政府建立關係以避免發生爭議。

在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召開以後，國家宗教事務局一位發言人說：「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同時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按照這一規定，中國各宗教包括天主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新華網》，2010年12月22日）該文反駁教廷不滿「八大」的言論（《梵蒂岡新聞》，2010年12月17日）稱：「教廷新聞室發表的聲明中聲稱，『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及民主辦教原則與天主教教義是無法調和的』，這是對中國天主教現狀的誤解，」這

發言人談到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新章程，強調主教團章程希望「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與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保持共融」。它援引新法規表示，主教團「履行牧職使命」，「依據主耶穌基督對宗徒們的派遣和聖神賦予宗徒們的權力」。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政府機構竟然可以決定什麼是符合天主教信仰，更甚的是這聲明來自一個信奉「科學唯物主義」的世俗政府。

事實上，中國這具爭議的教會規章並沒有具體要求中國教會必須遵守全球普世所奉行的法律，即《天主教法典》。這就解釋了教宗不批准在中國的主教團的理由。對於《愛國會章程》，它似乎與天主教教義和實踐大相逕庭。我們面對著的，是企圖干預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從而顛覆教會的行動。這帶來全國各地天主教徒社群極大痛苦和分裂。因此，可以斷然的說，這不利於「和諧社會」的發展，有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號召。

在這個新中國有怎樣的宗教自由

在二零一一年中國教會發生了多宗令人遺憾的事，嚴重影響天主教徒的生活。很多人目睹這些不容爭辯的事實，以致政府當局也無從否認。爲了對當前處境

有全面瞭解，所以要對這些事實先行評定。我想指出多宗事件涉及精神脅迫和肢體暴力，在強行帶走主教們去參加當局傳喚出席的全國代表會議，以及出席背離教宗的非法晉牧禮。

在自由世界裡，不會有政權借助警察武力操縱和脅迫主教們，如斯干預天主教的晉牧禮。不幸地，這行為證實了今日中國所宣稱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有條件實施的，全限於是否實現國家的政治目標而定，並不是以尊重信徒的合法傳統為考慮。

撒慕爾·格雷格 (Samuel Gregg) 認為，中梵對峙，正好表達出今日中國本身的困境，中國政權最擔心的是，表現出極其壟斷權力作為最終目標。這助長了腐敗侵蝕中國，亦否定一些關鍵組織嘗試舒緩其嚴重問題的僅有餘地。(《美國觀察家》2011年6月29日)

這些行為打擊中國威信，在世界舞台上蒙羞。正當中外學者經常強調，這種荒謬的使用武力手段，強加宗教立場予某些人，似乎證明左傾路線者圖謀在政府內佔上風。那麼，這豈不是倒退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悲的是，當政府當局借助警力強行在樂山（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汕頭（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舉

行非法主教祝聖禮，形勢進一步惡化。

教廷在事前已經通知有關人士何以教宗不任命他們爲主教，所以事後認爲有必要聲明，兩名候選人已自行招致絕罰，因爲他們嚴重違反教會法律（《梵蒂岡新聞》，2011年7月4日和16日）。此時，國家宗教事務局發言人反駁，宣布兩位主教的「所謂的『絕罰』威脅」是「極其無理和粗暴」的行爲（《新華社》，2011年7月25日）；除了「更堅定地走獨立自主自辦和自選自聖主教的道路」，重申愛國會「祝聖主教完全是爲了開展正常的教務管理和牧靈福傳工作需要。」

中國教會的未來令人擔憂。愛國會宣布至少定了日期要祝聖七位新主教。（《中國日報》，2011年7月22日）據韓德力神父表示，脅迫參與祝聖顯示中國宗教自由仍然是一個大問題。他說：「他們如此押送主教並強迫他們進行這些祝聖禮，在我看來，中國在整個世界面前顏面盡喪。」（《美聯社》，2011年7月22日）

幸好在某些情況下主教祝聖可以安然進行。這要歸功於當地教會堅持嚴格恪守教會法律，儘管政府及愛國會施加壓力和限制。在陝西省鳳翔教區，年屆八十九歲的李鏡峰老主教領導教區。在一九八零年接受秘密祝聖

的李主教在二零零四年獲政府認可，名字也被列入中國主教團之中，但他從來沒有加入愛國會。他為人正直和處事有智慧，曾經獲教宗本篤十六世邀請參加二零零五年的世界主教會議（可惜未能出席）。李主教已經選了張志勇神父為助理主教候選人，但八十歲的張神父沒有得到政府批准，決定辭職。

因此，李主教在二零一一年五月提名了四十七歲李會元神父為新的助理主教（有承繼權）候選人。投票是按政府的規定進行，李會元幾乎在沒有反對下獲接納為候選人（四十八票中得四十七票，包括三十六名神父、六位修女和六位教友）。由於新主教選舉按著「民主辦教」規則進行，國家宗教事務局官員確認了新主教選舉有效。李主教解釋祝聖禮將按照天主教法律，他將通知中國主教團投票結果。（《天亞社》，2011年5月23日）

另一方面，候選人本身似乎不願意接受主教任命。在內地多個網站上，有人發表強烈意見，一位中國教會觀察家質疑，當局怎麼可能允許使用嚴厲手段對待教會神職人員，尤其是那些不願意出任主教的司鐸。

在二零一二年的農曆新年，這個問題似乎沒完結。在河北省南部邯鄲（永年）教區氣氛緊張，它經歷了一

次非比尋常的晉牧禮。八十九歲高齡的楊祥泰主教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秘密祝聖孫繼根為他的助理主教。四十七歲的孫神父，先後擔任教區秘書長及副主教。在二零一零年，他當選助理主教候選人，晉牧禮定於六月二十九日聖伯多祿聖保祿瞻禮舉行。然而，政府當局不批准，聲稱日期接近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其實，政府向承德的非法主教郭金才施壓，要求他參加邯鄲教區的晉牧禮。

新任孫主教在秘密祝聖後不久，到了鄰近的河南省安陽（衛輝）教區避靜。當他出靜之際，在六月二十六日被警方帶到河北省省會石家莊軟禁問話。當時教區辦公室宣布，原定六月二十九日晉牧禮已告取消。事實上晉牧禮已經舉行了，當局只能接受事實，但堅持要帶新牧到醫院見年邁的楊主教對質和確認。楊主教因心臟病留院治療。孫繼根在七月初獲准返回教區，看來沒有消極後果。（《天亞社》，2011年11月7日）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

也有一些令人不悅的事，對於處理天主教事務的國家宗教事務局和統戰部的官員，時常傳召主教及教區人

員參加課程或者特殊學習旅程，爲要灌輸政治和愛國教育意識。相反，中國的主教們不能自行組織任何學習班，探討牧民、神學或倫理問題，除非有愛國會或者政府官員等「政治檢察員」在場監控。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的天主教代表會議，議決成立一些工作委員會，支持主教團的牧民職責。然而，主教們再次與愛國會共同領導這些工作委員會。換言之，他們無可避免又要被政治利用。這確是福建省閩東地區非法的詹思祿主教（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非法祝聖）所掌控下的牧靈與福傳委員會的情況，他於十月八至十二日在寧德市召開會議，有三十多人（多位主教、神父，一位修女和教友）參加，討論具體的福傳工作及交流經驗。罕見的是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專程從北京到場參加會議，更在會上強調中國天主教的「愛國主義的政治立場」，「積極引導」信眾「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應的道路」，並加強「愛國愛教、獨立自主辦教原則」。

一位筆名「山人」的中國大陸神父撰文道：「如果說基督徒不會愛國，需要愛國會來督導，這對中國信徒實在是個大侮辱！」（《天亞社》，2011年10月12日）

根據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團的經驗證明，教會領

袖感到有必要聚會，一起學習交流、完全自由分析討論一些神學、靈修或牧民問題，共同進行一些行動。在自由國家，他們聚會完全不成問題，不會受到任何政治監察人員的干預。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不可能的；再者，他們亦經常被迫參加政治學習班。（註七）

中國政府當局對愛國主義的沉溺，似乎已令到它敢於無所不用其極。不難看到，這些政策多年來給予愛國會等濫用權力的空間，證明自己不可或缺，又能保存國家榮耀，有著不受控制的權力把自己置於「主教之上」，一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慨嘆。

中國總理溫家寶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國慶演說中提到將會盡最大努力「大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維護司法公正，妥善化解各種社會矛盾，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有序。」但願當局考慮這些問題時不會忽視精神價值，才可促進真正的社會和諧。

教會內勇敢與軟弱表現

我們獲悉在二零一一年有多位神父被公安逮捕，他們多數屬於所謂的「地下」教會團體，即是拒絕愛國會的控制及不被政府信任的神職人員。在二零一一年八

月，在華東山東省荷澤（曹州）教區的四位神父，被關在省內東明縣看守所。他們被公安人員帶走時，正與其他神父在鹿泉村一間私人房屋內避靜。被捕的四位神父中，三人被拘留幾天後獲釋。

拘留期間，他們全部被隔離，逐一遭受公安人員的嚴苛拷問，更有國家保安人員和宗教局人員長時間盤問，不許休息。儘管他們被虐待，他們堅持不受唆使，沒有加入愛國會。他們的教區署理王成利神父，四十八歲，一直被關在監獄。

荷澤是一個小教區，自二零零四年以來沒有主教牧守。當教區署理王殿鐸主教去世後，教區只有四名官方承認的神父，以及一個小規模的地下團體繼續存在。

（《亞洲新聞》，2011年6月8日及12日）

另一方面，在北京附近的河北省，有幾位神父被拘留多時。宣化（張家口）教區陳海龍神父在二零零九年晉鐸後，在北京郊區的延慶堂區服務。他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被捕，受公安拘禁兩個多月。當局除了試圖說服他接受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外，還設法想找出八十多歲的「秘密祝聖」宣化教區趙克勛主教的藏身地方。他在二零零七年失蹤，下落不明。

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是宣化教區的其他三名神父被捕後，下落不明。兩個月後，他們獲得釋放。（《天亞社》，2011年8月4日）

在內蒙古自治區綏遠教區，在當地遼闊的地域，直到二零一零年四月才有一位官方認可的孟清祿主教被祝聖，他獲教廷批准及中國政府承認。

不過，綏遠秘密的天主教團體近幾年發展蓬勃，現在約有三十位神父；本來沒有多大問題，但是結果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日神父們卻被拘留，其中包括教區署理張若瑟、地下修院院長班占雄及三名堂區神父，他們當時在一間小屋聚會。（《天亞社》，2011年1月31日）

另一個更加複雜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西北甘肅省天水教區。當地主教趙經農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的一九八一年，在未有教宗批准下祝聖為主教。在一九八零年代，趙主教向教宗要求承認獲得批准，但他不能宣稱自己是天水教區主教，因為在此期間，一位秘密祝聖的主教王覓祿已經被任命為天水主教，後來，趙主教在二零零四年安息。

天水教區有兩萬教友，秘密團體佔相當大比例，他們與官方團體持續分成兩個社群，雙方共有三十位司

鐸，各佔一半。官方團體有教區署理趙建章，是趙經農主教的侄孫；而地下團體的署理王若翰，是王覓祿主教的胞弟（他與另一個胞兄弟王若望，同在二十年前受王覓祿祝聖為神父；儘管王覓祿虔誠熱切，他不是一位嚴謹的牧者，在二零零三年辭職）。在這種窘迫的局面，甘肅省統戰部已經在二零一零年宣稱，天水教區選聖新主教是優先處理事項。

在二零一一年八月，秘密團體多位領袖被逮捕，期間他們被集體安排接受密集式「學習班」。結果，天主教消息人士透露，在二零一二年初，王若翰（五十歲）已經秘密祝聖為主教，他在數星期之前得到教宗批准，消息逐漸披露。在十二月三十日，他再次被公安帶走，他與多位神父被強迫參加新的「學習班」；安全部人員一直想找出他的受祝聖主教的情況。

據法文《亞洲教會》報導，教廷準備王若翰成為天水教區主教時，已經批准趙建章為他的助理主教，這是明顯的努力幫助該教區恢復團結合一。不過趙建章的祝聖日期並沒有定下來。（《天亞社》，2011年8月23日，2012年1月10日；《亞洲教會》，2012年1月11日）

然而，在中國天主教團體內也有「未如人意的表

現」。我們得悉多位主教和教會代表被強行帶去參加官方活動；但是，事實上有主教和神父在沒有壓力之下參加，這助長政府推行控制教會的計劃。

我們很難知道他們有多情願與官方合作，因為不少神職人員擔心，若不跟教會組織合作，將來很難進行教會活動，因為教區財政往往控制在他們手中，不在主教的實際權限之下。如前所述，愛國會可以管理或控制由政府充公的教會主要房產，它們在毛澤東時期佔用多年，而愛國會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還給地方教會。

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撥出各種資源，一般通過愛國會轉交教會人員或機構，視乎他們的關係如何。對於在教會團體工作的人，經常遇到爭取更大權力的誘惑。

教宗本篤十六世最近到訪他的祖國德國時稱，教會要實踐她的責任，應繼續努力克服世俗主義。在二零一二年任命二十二位新樞機時，在二月十八日莊嚴儀式上，教宗本篤鄭重提醒新任樞機在履行職務時，必須在「統治與服務、自私與利他主義、佔有與給予、利益與無償服務」等之間作出選擇，這些截然不同的態度，互相對立，時常在挑戰人性。在另一個場合，教宗公開承認有些宗座官員，處於「仕途主義」的危機中。可悲的

是，教會組織的人性一面是何等脆弱，這在最近發生的事件給披露，有媒體迅速報導出來。

其實，沒有人會哄騙自己以為中國教會沒有以上的危機和弱點。中國的具體情況，使上述的誘惑顯得特別嚴重；對於渴望要闖一番事業的人而言，路途很簡單，只要順著政府對處理教會問題的優次去走即可。目前，實在難以估量影響多深遠。但這一直是統一戰線政策，促使宗教領袖獲選或出任重要的公職，諸如各級的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甚至人民代表會議（人大）成員。那麼，在官方教會的架構之中，「民主選舉」晉身領導崗位，有時此舉對於一些人會涉及利益關係。（註八）

不過，河北省滄州（獻縣）教區李連貴主教，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躲藏以避免參加全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這事件發生在他被撤銷河北省政協職務不久。

近期，東北遼寧（瀋陽）教區裴軍民主教受到懲罰，因為（在他被誘使參加承德的郭金才主教祝聖禮後），他又被要求主持汕頭教區黃炳章的非法主教祝聖禮，但幸虧他能有神父們的保護和教友支持，抵禦當局的強權壓力而逃過一劫。自此，他一直被圈限於主教府，不允許接見他的神父或牧訪其堂區。裴主教在政府認可的主

教團副主席，以及遼寧省愛國會與教務委員會副主席之職，則被「暫停」。政府爲了掩飾事件，反指裴主教自己呈辭該些職位。

至於「一會一團」的官方發言人楊宇被問及此事時，他的答覆模糊，他否認停職事件，表示「一會一團官方網站沒有相關公布，裴主教的名字和簡歷仍然存在。」（《天亞社》，2011年10月21日）。

建設性對話是優先需要

上述多宗事件明確指出，關鍵仍然繫於主教人選和祝聖，而天主教教義和實踐要求教宗的批准，作爲決定性的因素，中國當局視這些爲「干涉國家內政」。從「政治」角度解讀這些事件，國家宗教事務局發言人的專橫曲解事實，並不令人驚訝：「如梵方也有改善關係的誠意，就應撤銷所謂『絕罰』，切實回到對話的正確軌道上來。」（《新華網》，2011年7月25日）

我們理解政府官員接受的是唯物主義教育，可能不太熟悉天主教教義。但是，他們身爲宗教領域專家，不能指望教宗在這個重要議題上擯棄傳統教會的教義，否則這會危及天主教的具體本質，況且這做法是全球各地

教會都認同的原則。

北京過去多年，似乎針對要求教廷切斷與「中華民國」自一九四零年代與教廷建立的外交關係。近年，兩岸政府關係有所改善，中共對此目標的優先隨之降級。然而，北京並未忽視教宗享有的國際聲譽。國家宗教事務局發言人在上述聲明中反覆說：「希望通過建設性對話與梵蒂岡探討改善關係的途徑和辦法。」

教宗本篤十六世，一如前任的若望保祿二世，已經再三表達他誠摯期望達到一個「建設性對話」，以便解決當下棘手問題。從現在開始，這些意念成爲事實，能夠有把握的找出重新啓動對話的方式。中國歷代智慧訓誨，只有讓兩個競爭者感到，勝利一方可以確保持久和平。在當前形勢下，不容易找出「雙贏解決方案」。

依我看來，應尋求一個有建設性的對話，在實踐行動中，要制訂一系列法規以尊重政府的權威和聲望，又不會在信徒間製造新的分裂及緊張局面。爲了肯定這一點，負責對話者應獲得雙方確認為代表，有能力進行談判，本著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態度，並獲授權簽署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協議。在二零零四年底，由中國國務院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相比以往，顯示對宗教的處理較

過往進步。然而，其中仍有幾點十分模糊，「宗教信仰」的定義即為一例。除此之外，一些不必要的重擔放在表達信仰的信徒身上，甚至當社會和諧或公共利益不受損害的情況下亦然。

關於天主教教會，希望北京政府會進一步保證，天主教徒可以根據天主教傳統管理自己的宗教活動，不再需要忍受地方幹部濫用權力。天主教團體在推動社會和平的決心是一致的，他們會按照法律和促進公共利益行事。他們在登記方面，按各級宗教事務局的要求，都沒有顯示不合作或留難的地方。但是，強迫個別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團體加入或成為愛國會成員，則絕不允許發生。他們也不能被勒索或誘使去登記。因為這關乎一個組織的性質，加入與否應當是自由的決定。在中國往往採用某些方法，既不利於建立「和諧社會」，結果又造成執行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員被人詬病。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至今所有指向開展積極對話的努力，顯示出天主教一方的立場欠缺一致。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的信函，訂定了重要的指導方針，但不能規限某一種方法較能使對話成功及取得進展。因此，我們期望由教宗任命的研究小組，在監察形勢及審

視目前的緊急狀況下，能考慮到問題的各方面而向教廷提供審慎並有建設性的提議。

多位評論家深信，在訂立一個持久協議要有先決條件，羅馬必須要求政府撤銷它所建立用以「指導」中國天主教徒生活的架構組織。我的觀點是，這是不合乎現實的想法。

不過，我敢於提出一個同樣重要的建議。在我看來，是可行的及有利於訂立協議。我認為應該向中國當局提出，作為和解的姿態，要授權中國主教團去研究並修訂規章多項細則，使其與天主教教義完全一致並可以實踐出來的。愛國會也需要對其規章進行多項修訂，撤銷所有要求主教團把重要決定交由愛國會批准的細則。這方面的修訂將有助開放主教團予所有的中國主教，這也有利於得到教廷的承認。若然如此，我相信天主教徒在接受愛國會時所遇的良心問題會稍為減輕。

我很清楚，這項提議將帶來某些方面巨大障礙，因為它在表面上看似具挑釁性。但我深信，如果獲得接受，將促使雙方接觸邁出一大步。中國當局如能運用民主原則來處理一會一團，它的聲望將得以保障。

其實，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發言人已表明，可以接受

中國主教團跟隨天主教教義中與教宗共融的原則。一旦天主教會的性質不受到損害，就可以對具體問題展開討論，以便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成功在望。◆

註釋

註一：本章內容刊在香港聖神研究中心，《鼎》，題為《為在中國祝聖主教問題進一言》，第 163 期，2011 年，中文第 17-26 頁）。目前的版本，更新資料至 2012 年 2 月。

註二：探討這問題的各方面，參閱《鼎》，第 162 期，2011 年。

註三：梵蒂岡與意大利政府簽署了《拉特朗條約》(1929 年)。意大利最高法院的裁決 (6569 號，1979 年 12 月 18 日) 解釋，國際承認教廷，包括天主教會和梵蒂岡城。

註四：這是按教廷傳信部 1978 年 6 月通過的一項法令執行。

註五：請參閱林瑞琪，《一九八一年中國主教秘密祝聖的歷史意義》，《鼎》，第 163 期，2011 年，中文第 27-39 頁。同期的另一篇相關文章，曾其光 (Giancarlo Politi) 撰寫，《三十年後回顧中國地下主教祝聖》，中文第 4-16 頁。

註六：《教會憲章》在第三章，有一註釋由教宗保祿六世要

求加入，得到大多數與會者批准。它指明，當主教可以在教會完全行使管治等權力之前，聖事祝聖等必須得到宗座最高當局的任命。

註七：2011年9月，當我陪同一批朋友到中國訪問時，我接觸一些地方教會打算參加當地的主日彌撒。有人告訴我，在九月中，西安教區黨明彥主教不在他的教區，因為他要去北京參加為期三個月的學習課程，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校）舉行。這是第六次政治教育課程，特別為宗教領袖而設。

註八：這些秘密祝聖主教當然不包括在內。至於過去非法祝聖的主教們，又得到教宗承認。中國當局睜一眼閉一眼而已。

第五章 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

唇齒相依

一百年前，投身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國熱血青年，大多數都宣稱自己反對傳統觀念而又拒絕基督宗教，認為這從西方引進的「邪神異教」已在侵略殘害國人。不過，有些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必須擁有令西方強大的技術、科學和方法，而不是他們的文化價值。然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華民國由國民黨蔣介石領導，他在政治等方面傾向西方。

隨著馬克思主義革命風潮席捲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新文化模式，依然是來自西面的，但今次是來自莫斯科；在建立新中國後，毛澤東以反對偶像崇拜的憤怒方

式對待中國文化傳統，提倡「文化揚棄論」，要「化毒草為肥料」認為這些幾千年的文化遺產，只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肥料」。

幸好，今天許多中共領導人認為有必要重新發揚中國文化傳統，好好保存這瑰寶和文化遺產。當他們再次欣賞源遠流長的文化價值時，也許發掘到可供討論和對話的寶貴機會，從危機中認識到威脅教會身份的背景和它的未來。我深信，只要平心反省目前的問題所帶來社會和歷史的影響，就會對前路充滿信心和希望。但願這顆信心充滿投身傳揚福音的人，使中國人民真正認識到福音的價值。

不明朗的政治環境

從多方資訊顯示，似乎在今日的中國仍有極左勢力，也許令人回想到昔日「四人幫」的力量，把國家「宗教政策」推向衝突。這場危機可能與共產黨不同派別，爭奪政治局的主導地位，以便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中佔上風。然而，一些溫和務實的力量可以再平衡局勢，以制訂政治經濟策略，並使國家在本身及在國際社會上進步。因此，預測今後如何沒有什麼意義，這場鬥

爭在領導人有定局以後便會停止。

目前，所有目光集中在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一九五三年生)，他早已被媒體稱為「指定的國家主席」。他屬於新一代「太子黨」，其父習仲勛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逝世，享年八十九歲；習仲勛是毛澤東的伙伴，兩次成爲清除的目標，他曾與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後共事。文革期間，習近平下鄉住在農村七年，他是改革派胡耀邦的學生，當過福建、浙江省長，隨後做上海市委書記。他持有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有一個女兒在哈佛大學讀書。另外，繼溫家寶之後接任總理的李克強(一九五五年生)，是上一屆中央政治局九名成員之一，長時間在河南省工作。他修讀法律和有經濟學學位。

省級官員汪洋亦是政治局委員。他在重慶處理經濟取得成績，出任廣東省黨委書記。在二零一二年農曆新年前，汪洋以罕有方法平息了廣東省烏坎村衝突，調解村民與官方矛盾。他撤換當地黨委(被指貪污)和任用村領袖，這領袖有份抵抗警察鎮壓。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表會議上，汪洋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又說「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而政府的角色是協助人民群

眾「各盡所能地追求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亞洲新聞》，2012年5月10日)(註一)

美國《福布斯》雜誌選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二零一一年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甚至在奧巴馬之上。理由是胡「實行專政駕馭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是全球最龐大軍隊之首。他可改變河流、建設大都會、監禁持不同政見者、審查互聯網，而不受層級架構的制衡」。《福布斯》雜誌這本「資本主義聖經」戲稱這些特質為胡錦濤的「優點」，他的權力近乎完全不受控制。另一方面，中國有人批評《福布斯》雜誌，指出胡錦濤在政治局內畢竟只是「同輩中資格最老的一個」，這獎項應該歸於共產黨。(意大利《共和報》，2011年11月5日)然而，似乎沒有人挑戰胡錦濤多次提出的「和諧社會」理念。問題是，中國現實中日益面對尖銳矛盾和暴力局面，要用什麼方法來培養中國的和諧社會。這些都受到近三十年來紛亂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社會良知似乎蕩然無存；也因為中國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沒有足夠改革所致。

法國的杜小安形容中國的道德危機，由「六種典型罪行」所造成，包括賣淫、色情、販賣婦女和兒童、賭博、吸毒、迷信。這些洪水猛獸，是因為社會缺乏共同

道德基礎所形成。

要「致富」已經成爲中國人共同存在的理由，他們希望補償幾十年來因爲政治理念所造成的貧乏。年長一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承諾感到失望，今天且受到新社會衝擊而變成資本主義者。立志致富的青年卻對於建制、個人之間和世代之間的信任崩潰。

美國著名的八十四歲宗教社會學者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在他新書《人類進化中的宗教》，探討古代以色列、希臘、中國和印度文化的信仰與倫理的起源，從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他到訪中國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接受訪問（註二），他將秦始皇與毛澤東等量齊觀。秦始皇，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是法家哲學的追隨者，主張嚴厲懲罰以迫使人民降服及建立強勢政府，壓制所有批評，焚書坑儒；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中國，施行鐵腕統治直至他一九七六逝世。「毛澤東推崇秦始皇，曾誇口可以坑儒人數比秦始皇多。」貝拉強調：「暴政行不通的。秦始皇的短暫王朝證明了這一點。」今天，中國人道德下滑，馬克思主義不能提供一個有條理的道德體系來指示生活。事實上，「從幼兒園到大學，人們都在學習馬克思主義，

在在顯示出他們（執政者）心信他們擁有一個公民宗教。」但許多中國人對此一笑了之，這才是大問題。要在「毛澤東思想」中，分開善惡是徒然的。他說：「我相信，中國要面對一個事實，毛澤東是一個怪物，在人類歷史上最醜陋的一類人。」因此，「國家必須先解除毛澤東暴虐的符咒」。

貝拉認為，尋找一個道德基礎，對一個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要的國家來說，顯得尤為迫切。他說，在良好的基礎上，以中國的天、禮、義等傳統觀念，建立一個有效的道德體系。他有機會與一些知識分子討論其書的內容，在北京《中國日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一篇張周項寫的書評使貝拉大感意外，強調「禮」賦予統治者一種治理權利的理由，但同時引伸出要善待被統治者。文中強調，被管治的人有責任遵守紀律；但假如（在上者）違反社會契約，他們亦有權另擇管治者。今天，中國的統治者在控制人口，以維持治安為理由來管治。據貝拉，中國有著偉大的道德資源，在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人中找到這份情操。當人都在追求幸福和自由時，精神的傳統價值蓬勃發展，以佛教、儒教、道教、民間宗教和基督信仰等表達出來。

天主教會有何新機遇？

在中國，溫家寶總理談及「道德危機論」，但是中共領導層認為，黨本身有能力解決這個危機，再次倡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可是現實並不如此，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弟茂德·嘉登（Tim Gardan）訪問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教授何光滬，何教授說：「崇拜財神，已經成為很多中國人生活的目的。我想這是很自然許多人不會滿足，要為自己的生活尋找意義，所以當基督信仰走進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會緊緊的捉住不放。」根據嘉登的報導，現在令統治階層某些人士擔憂的是，他們確實知道很多投向教會找尋意義。（《英國廣播公司》新聞，2011年9月11日）

再者，在今天的中國，基督信仰如此吸引，某程度上是人民抗衡囂張的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這些心態腐化共產黨，使它失去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式的魅力。新中國成為它本身優越成就的受害者。中國經濟起飛，鄧小平的口號「致富光榮」鼓勵了很多人掙錢。不過，金錢被置於最高價值時，就會丟掉了社會的靈魂。

香港《英文公教報》報導了這個故事（2011年10月9日）：「在九月四日上午，在繁盛的武漢市，一位八

十八歲老翁倒在大街上鼻子受傷，有幾十甚至幾百個途人經過他身旁，沒有人扶他一把。一個半小時後，他的親屬抵達現場，方才送他到醫院救治。」該文引述《亞洲新聞》說：「中共官方《人民日報》進行了一項網上投票，詢問讀者是否幫助那位老人家。超過百分之八十回覆者表示，他們也許掩面而過，怕被敲詐。」該報綜合意見，解釋「怕」不是沒有根據。因此，衛生部發出一份長指引，在這具體情況下，建議途人致電老人的親屬送他到醫院。隨後，互聯網上激發辯論。一位《新浪微博》博客道：「如果我們無法與他們取得聯繫，該怎麼辦？就讓他們這樣死去嗎？」

然而，類似的甚至更悲慘的故事，在中國並不罕見。在二零一一年，一名兩歲女孩在街道上兩次被車輛撞倒死去，沒有人停下來拯救她。爲了杜絕這些不人道的行爲，深圳將通過一條鼓勵近似「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法案，保護施救者免陷於惹上麻煩的風險，從而避免遇難者因人們怕麻煩而失救。

在二零一一年，中國倫理學會慈孝專業文化委員會提出了一個項目，目的是五年內培養一百萬名兒童建立儒家思想的要義：孝道。（意大利《晚郵報》，2011年

11月4日)。在同一時間，為針對一個存在於今天新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政府公務員部門將啓動一個新運動，為三百七十萬僱員在未來五年間，強制進修道德課程，以促進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的信心。它承認，「有越來越多的公務員，公開承認進行不道德行爲、謀取私利而不是顧及公益、濫用職權及浪費公帑等。」(《將臨報》，2011年12月28日)

一位中國異見人士廖亦武被監禁和迫害，他成功逃往越南，隨後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他在二零一一年出版了一本新書《上帝是紅色的：基督如何在共產極權開花結果的故事》。在他的十八篇訪問和撰寫文章中，他說了關於「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國共產主義社會生存和蓬勃發展的秘密故事」。他介紹自己為「非信徒」，他堅信中國正在經歷精神危機，其中「人民的心糾纏和混亂」。他說，他「從基督徒身上看到建設一個新中國所需的品格：樂觀、誠實、願意付出，以及饒恕的精神。」(《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1年9月13日)

正如杜小安指出：「此時，中國夢想向世界傳播其智慧，可惜其領導人不明白天主教徒在中國的偉大貢獻，一旦能夠實現，信徒就可以自由充分地與普世教會

連繫。」中國領導人是否明白到，宗教自由和民主是一個有力措施，可以補足現正威脅中國社會的紛亂，從而也為中國經濟提供相當的價值。

另一方面，現實中台灣正逐漸走近「祖國」，也出奇地在這方面創造了一些有利條件。二零一一年夏天，有新聞報導，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北京設立辦事處，準備招收來自大陸的學生，包括提供獎學金。北京官方的《新華社》稱「輔仁」為「寶島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目前，已經有不少修生及約四十名修女，在台北輔仁大學的神學院讀書，他們有足夠的靈修指導。與此同時，台灣最近幾次的政治選舉的結果，亦帶來間接但正面的作用。馬英九連任總統，當然是國民黨的成功，但這也被各種評論視為是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的一大勝利，他謹慎支持對話和台灣的和解，以邁向未來的統一。（註三）倘若胡錦濤在下一次黨代表大會能提出新的善舉：支持宗教界，特別是天主教會的和平作用，可能對於他的「和諧社會」理念非常有利。

所謂的「橋樑教會」（香港、澳門、台灣）也許需要更善用他們的機遇，特別在目前的變幻莫測形勢下，對教會的崇高目標作出貢獻。他們可以通過旅遊探訪大

陸團體，或透過商務或文化活動，給教會內的兄弟增加新的信心。團體的互訪，也可能會提供牧民經驗交流，鼓勵信徒之間的社會承諾，更好地利用互聯網和現代科技增加聯繫。最重要的是支援中國大陸的神父、修女和教友領袖的信仰培育工作。在這一點上，美國和歐洲的教會，也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現在，隨著旅遊業在中國社會中越來越普遍，我們中國的基督徒弟兄應該有機會去一些基督信仰的歷史遺蹟朝聖，探訪著名的聖地。另一方面，西方的天主教遊客應該可以理解，即使是簡單的信仰見證都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例如，組織旅遊團訪問中國，使他們能夠在主日參加與當地城市的教會團體的彌撒；這類的交流探訪應當事先安排，因為有時當地導遊不樂於配合這種「另類」的旅遊點。（註四）

只要對話而不是爭議性的對抗，國際輿論有時可對中國政府監察，起了積極的影響力。天主教《亞洲新聞》把「二零一一年獎項」頒予兩位屬於中國地下教會的主教，他們已經多年沒有音信。事件得到多個媒體主動報導。兩位主教是：近八十歲的蘇志民主教（河北保定教區），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被警方逮捕起被囚至今：

(他前後已經在監獄共達四十年之久；)以及易縣教區(河北)師恩祥主教，九十歲，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三日被捕。(他被監禁共五十一年有多。)

據《亞洲新聞》社長貝納德(Bernardo Cervellera)，兩位在囚主教可能「已被人遺忘，儘管他們經歷多年為真理、尊嚴和公義鬥爭」。《亞洲新聞》分別寫信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國駐意大利大使，要求釋放三位主教和六位神父，他們都是未經審訊而被關押。除了上述兩位主教，名單中包括：地下教會的保定教區(河北)的副主教鹿根君神父，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被警方帶走。然而，龍年似乎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處境。「主教和神父們被拘留或正在遭受不公平對待，限制他們履行使命」的困境，在教宗任命的中國委員會最近的會議上，表示「欽佩他們的信仰和他們與聖父共融付出的力量。」

根據天主教消息來源，二零一二年復活節中國當局釋放浙江省溫州教區邵祝敏主教，他被拘留四個星期，顯然是指他參與一次地下教會的晉牧禮，他與其他四位非官方團體的主教，祝聖了地下教會的天水教區主教。四十九歲的主教被迫參與洗腦課程，在政府官員的陪同下前往四川省樂山教區探訪已遭絕罰的雷世銀，雷氏又

帶他們參觀了一間教會辦的醫院、賓館和新的主教府。邵主教被警告要約束自己，不得隨意到全國各地探訪經商的溫州教友，他們走遍全國各地經商。他的副主教姜溯念神父一直伴隨邵牧，比他早一個星期獲釋放。在河南，南陽教區靳祿崗主教在聖週四（四月四日）被政府官員帶走，明顯要阻止他與神父們一起慶祝復活節。他被關押在賓館，又被帶去幾處旅遊點，復活主日獲釋。（《天亞社》，2012年4月16日；《英文公教報》，2012年4月28日）。這些事實說明當局要以武力或勸說消除地下團體的力量，並誘使神職人員接受官方路線。

更新成長

意大利政治評論家方濟·西斯齊（Francesco Sisci）指出，如果中國天主教徒都保證羅馬對中國沒有政治野心，相信危機勢將消失。「目前衝突的根源是在天主教會內。」天主教徒分裂造成這衝突，因為有些服從羅馬的權力，而另一些則被指為叛徒；結果，對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中邀請的教會團結合一，雙方都不願接受。（《亞洲時報在線》，2011年7月20日）。

西斯齊的批評有一定基礎，天主教徒之間缺乏團結

合一是一個痛苦的現實。然而，共產黨的政策確是推波助瀾，鼓吹他們分裂，一如我們觀察所得，教會團體和主教們本身，從來不被允許他們聚會，就教義和牧民問題坦率分享意見。主教們也不能夠向媒體或公眾討論他們的看法，因為法規禁止所有「宗教宣傳」。不過，專制的中國政權，十分清楚「分而治之」這句經典說法。

雖然中方擔心「羅馬」（即教廷）可能以敵意的目光投向中國和其政府，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的信函中已經明確表示，他尊重中國並渴望與中國當局進行對話。他不要求特權，只是簡單希望有可以充分表達福音理念。教宗本篤希望在「信德年」期間（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國也會得到很多恩寵，最重要的是「信德得以增強，當其傳給他人時！」（《救主的使命》通諭，第2號）

梵二會議召開五十年後，教宗關心整個信仰團體要進行「新福傳」，而世界主教會議亦就這題目進行討論。

「新」的意念清楚表達，當中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梵二的視野，以達到「更新」教會的目標，使之成為新的；以神聖啓示的恆常元素，透過一種合適的方式，在快速轉型的世界和歐洲以外的文化表達出來。事實上，

大會沒有發表任何明確譴責共產主義的文件，（對此，教會當局已明確表示立場，）反而使一些人感到意外。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致世界傳教日文告中表達有迫切性福傳，福音宣講可以具體實踐幫助鄰人、為最貧窮者伸張正義、在每一個階段支持發展和尊重生命。中國教會，在二十世紀中葉，數以千計的外國傳教士受盡凌辱，他們克服了前所未聞的暴風雨，又在今天參與這迫切的福傳任務。這是信仰根深蒂固的成果，一如在中國有許多信徒的經歷。（註五）

在利瑪竇神父努力把福音帶入明朝社會時，他的優先工作是關注包括知識分子的新領洗入教者的培育。典型之一是徐光啓（一五六二至一六三三年），他帶領整個的家庭皈依（他在一六零三年以保祿聖名受洗），他是朝廷官員和學者，在文學和科學都有貢獻。利瑪竇形容徐光啓是他在中國宣揚基督信仰方面「最重要的支持者」。徐光啓的政治生涯結束前，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他將福音信仰帶到家鄉上海，在當地安葬，亦在當地備受崇奉。金魯賢主教積極推動徐光啓列真福品案。金主教在二零一二年（時年九十五歲）農曆新年牧函，提及徐光啓誕辰四百五十周年，叮囑上海的教友

學習徐光啓這位先賢和他的基督徒典範。他強調，徐光啓尊重中國文化，並盡可能保護教會團體。(註六)

沙百里高度表揚中國教會內的平信徒真摯信仰的根基，揭示過去眾多中國天主教徒的慷慨行爲及信仰的價值。(註七) 多次迫害使天主教團體萎縮，但是他們的見證，受到基督救贖犧牲的祝福，直至今天，他們精神仍然存在。在這個迅速變化的社會，我們要幫助團體恢復信心是很重要，使信徒活出信仰，參與建立富於人文精神和創造力的文化。現今的中國天主教徒，雖然數目仍然很少，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仍然可以更好地作出貢獻。香港教區的《英文公教報》社論，評論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不勝費力跑去寧德（福建）向天主教領袖說，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堅持愛國主義。一位神父在博客駁斥道，此說是侮辱中國基督徒，誰說他們不愛自己的國家。該週報說，有教友在美國設立網站，提供定期更新中國天主教徒貢獻教會和社會公益的資訊。(《英文公教報》，2011年10月23日)

該報的《神州橋樑》版一期專論中國的天主教修女的無私奉獻，一如毛澤東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英文公教報》，2012年3月18日)在社會服務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方舟啓智中心」，二零零五年九月在南京教區開辦，給家中有智障或精神病人士的家庭提供服務。「全面服務，個性化服務」是院舍的修女和十七名聘任教師和志願者的口號，他們培訓中心的六十名學生，週一至週五上課，有物理治療、生活技能訓練、職業培訓和基礎教育四方面。南京當地政府支持這服務，但中國仍然有很多人這些需要，尤其是在落後地區，有些有天主教修女服務，在缺乏支持及受到官僚架構限制之下，仍能提供不少免費服務。

香港《南華早報》的《領袖》一欄（2012年4月27日）指出，大陸當局至今一直嚴格控制非政府組織活動，為防止他們挑戰權威。這也牽涉到他們對外國資助團體和維權組織的質疑。此外，中國紅十字會在捐款的醜聞，削弱公眾對慈善及非政府組織的信心。民政部目前展開工作，希望恢復政府及這些組織的信譽。該文說，加強透明度，北京也應該開拓外國非政府組織在華工作，開闢捐款扣稅制度，好能鼓勵日益富裕的社會建立捐款文化。如果能確認福音中所啓發的道德原則，對中國社會的失衡發展會帶來正面的作用；如果容許天主教徒發揮道德影響力，可以緩解腐敗問題。真確的教會

訓導致力於在各個層面及各種處境中促進正面的價值觀和公益責任，並譴責任何出於利己主義的選擇。

新中國強調法治，但是實在有太多事例看到人們濫用「關係」或爲了達到個人利益。現在，中國有迫切需要去反思這狀況。其實，天主教會也面對相同的威脅和風險。不少中國教區的信眾都關心誰是適合的主教候選人，因此，他們希望候選人是正直有信德，不靠裙帶關係，這才會得到天主的祝福及能夠對社會做出貢獻。在此，想起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一一年九月探訪德國時曾說，一個理想的教會，組織應當盡量簡單、盡少財富和權力，這才是基督所希望的教會。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因爲它相反現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一一年春季接見中國委員會時強調，「在中國教會的各個層面，在信仰中，需要一個良好的教育」，因此「特別是靈修培育，幫助教友勇於接受現在困難的挑戰。」

困難挑戰等著我們

要克服當前的困難和挑戰，中國的天主教徒必須維護和強化彼此之間及與普世教會的團結。在這方面，我

們必須重提主教作為牧者在過往本來一直肩負的重要角色。他們既要捍衛教會的權益，亦要促進各自團體的凝聚力。然而，神職人員相繼去世，年邁主教只有少數仍留在主教職位，在二零一零年，有三位八十四至九十九歲之間的年老主教安息。在二零一一年，再有五位年近九十歲的主教因病逝世，他們多數不被中國政府承認；公開教會方面，有四十五歲的湖北省宜昌教區呂守旺主教因病去世。不幸的，在二零一一年底，地下教會幾位年輕司鐸和修生在一宗交通事故中死亡。

對於今天的上海教會，意大利的瓦倫特最近在媒體發表文章說，九十多歲的金魯賢主教因肋骨折斷，需要在醫院接受治療幾個星期，最後決定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任命一位新的副主教馬達欽。馬神父在文化和牧民方面的工作廣受讚賞。任命使人寄望這個重要的教區領導層可以順利交接。本來已經有輔理主教邢文之領導，他向來對教會忠愛著稱，在二零零五年晉牧時同時獲得教廷和中國政府同意。然而，邢主教來自上海以外的省份，使他不難融入複雜的都會現實；近期有消息稱他已經放棄其牧職。（註八）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同是獲得教宗批准及中國政府承認的馬達欽晉牧，擔任上海教區輔

理主教，因他公開辭退愛國會職務而被軟禁。現在上海的局面變得嚴峻，越來越複雜。

教會亦面對其自主權受到政府干預的困難，例如山西省太原修院面臨政府介入。這修院被關閉三十多年，早於一九八五年重開，二十多年來培養了約二百位神父。近年，有七十名學生和八位全職老師和五位增聘老師。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八日，修院董事會宣布關閉修院以及常同希（太原教區）辭去院長職務，因為管理方式和個人行為出現問題。省宗教局支持院長要求廢除停職決定；然而，董事會堅持決定，並認為主教們有充分權力指導和決定修院事宜和培育神父。（《英文公教報》，2011年10月2日）。該修院數個月後重開，只有少數修生上課，因為省內主教已經把修生送到其他修院繼續學業。這場與宗教局爭議似乎尚未解決。因為院長辦公室仍堆滿原任院長的東西。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的《英文公教報》頭版報導，引用了《梵蒂岡內幕》關於湖南省長沙教區屈藹林神父（一九六一年生）於四月二十五日的祝聖禮。「北京持續要那些在羅馬方面認為身份有問題的中國主教們去參加晉牧禮，這帶出基本問題，究竟中國當局是否

真誠與教廷建立和諧的關係。」雖然典禮具備條件（候選人獲得教廷及政府兩方批准），到場的竟然有兩位在教會角度是不合規格的主教，使晉牧禮又捲入另一次「爭議和張力」。主禮的是北京教區李山主教，他是教廷二零零七年批准祝聖的主教，但至今參加了兩次非法祝聖活動；梵方尚未收到他任何書信解釋這舉動。其他參禮的四名主教，全部都是共融和獲北京批准的主教。唯獨安徽省蕪湖教區劉新紅出席，他在二零零六年非法祝聖。愛國會副主席劉元龍宣讀了統戰部和宗教局的信息。《天亞社》引述一項消息說：「似乎北京採用了新的策略，以製造更多混亂，挑起教會的分裂。」對於這樣重要的事情，有關二萬天主教徒在一個沒有主教十多年的教區，只有二百人可以參加祝聖禮彌撒。

在二零一一年聖誕節，香港《英文公教報》的《神州橋樑》版，回顧了中國教會的創傷，由年內有多宗非法主教祝聖，不僅是中國和教廷之間的關係複雜，但「造成了混亂，令教友失去信心和在他們之間造成分裂。這些裂縫只有在懺悔與和解中修復。」它說，有神父、修士和教友們說，他們參加沒有獲得教宗承認的主教，或者曾經參加過非法祝聖的主教的彌撒時，內心非常不平

安。華北一位年輕的主教，負責管理一個並不和諧的教區，他強調，平安是耶穌給我們，是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果實。一位在福建省的神父表示，教友團體尚未能生活在和諧中，他們需要學習寬容以助克服這些分歧。

以不同方式面對複雜現實

在這個複雜的現實環境中，各方提出不同意見以改善天主教會地位。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撰文說，尊重老朋友的同時，需要在言談中提出爭議之處。

（《亞洲新聞》，2012年2月7日）他挑戰瓦倫特對江西省南昌教區李蘇光主教的訪問，刊登在《三十天》雜誌。（2011年，第9號，第30-35頁）李主教被引述說：

「對宗徒傳下來的一切，中國教會絲毫沒有改變。」樞機也批評聖艾智德團體邀請李牧參加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慕尼黑舉行的文化對話國際會議，樞機認為，「從教會的觀點來看，他是嚴重妥協的人物。」

然而，我想分享一些個人經驗。過去，聖艾智德團體早年曾邀請中國代表團參與宗教間對話，大約二十年前在馬耳他舉行。多得「天下一家協會」的邀請，我參加了這次活動，我記得準備對話很困難，選擇邀請的客

人是不可能的。幸而代表團由劉柏年率領，成員還有基督教徒和佛教僧侶及兩位天主教徒，萬州教區段蔭明主教是其中之一。由於代表團要在羅馬轉機短暫停留，我陪同朋友們參觀基督徒古蹟，但絕對嚴禁與梵方官員會面。然而，當時是一九九一年十月，段主教簡短探訪其母校傳信公學，他在一九四零年代在那學院讀書。後來，聖艾智德團體在歐洲其他國家舉行會議，一些傳信部官員在那些場合會晤中國天主教代表。

因此，李穌光主教的表達，再次喚起我對三十年前一些傷心回憶。在一九八二年，當中國主教團成立和愛國會重組後，我已經感到有需要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達一些基本問題，表明它的局限和矛盾。中國教會領導人經常強調，他們是同一教會「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成員，我卻強調，教會必須是具體、特定，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在四百年前利瑪竇神父和其兄弟們建立起來。然後，我問這些天主教代表，他們有同樣的信念但是沒有實施具體的教會生活。（註九）我也帶有哀愁地告訴他們：「東正教及聖公會在這數世紀以來的經驗，正好鏗鏘有力地道出上述這項歷史發展上不能改變的絕對法則。」

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承認實踐層次上依然有矛盾存在。再者，陳日君樞機指出，瓦倫特不隱瞞事實，李主教有參加在七月十四日汕頭非法祝聖，我相信，李主教很清楚屬於一個罪人的教會。（我們何嘗不是！）因此，我嘗試從積極一面看：中國教會不打算改變信仰的傳統成份。我認為，可嘗試一個積極的做法，重申本書第四章提到的具體選擇，中國主教必須修改目前主教團和愛國會兩份《章程》，刪除牴觸天主教教義的條文。

陳日君樞機激昂的勉語，再次提醒我們「橋樑教會」的特殊地位，讓普世教會知道在漫長加爾瓦略山的情況，分享在中共政權下生活的兄弟的信仰。香港天主教社會致力為大陸教會以各種方式支持基督徒，包括聖神研究中心所作的貢獻，使普世教會更好地了解中國教會的情況。由香港教區的正義和平委員會翻譯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二零一一年在香港出版中文翻譯，也將證明是一個有價值的培育工具。

教宗本篤十六世擢昇陳樞機的繼任人香港教區主教湯漢為樞機，意在強化「橋樑教會」的召請。湯樞機在一次訪問中指出：「在二零零八年，我被邀請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禮。我告訴他們，我感到很高興地接受邀

請，奧運會是一個好機會為我國爭光。我們建立了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後，我對他們說，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關注仍然在監獄的中國主教。我向他們解釋，這其實不利於國家。如果這些主教可以再次充分享受自由和其人權被尊重，他們定能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同時，他們獲得釋放，中國可以在國際社會享有較高的聲譽。」（《亞洲新聞》，2012年2月16日）

陳、湯兩位樞機，連同澳門和台灣主教們，以及教廷聖部一些官員等，出席梵蒂岡的中國教會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羅馬舉行。與會者對中國教會「確認的忠誠和奉獻精神」，在信德中深刻表達信仰。他們強調信眾需要滋養他們的基督徒生活，「參與公民生活和工作的世界，提供自己的貢獻的責任，熱愛生命，尊重它從受孕到自然死亡，愛家庭，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愛自己的國家，有關誠實的公民的共同利益。」

委員會稱讚中國教會在社區貧乏及欠缺靈修培育資源之下，仍在福傳工作上創出積極的成果（以領洗人數而言），但委員亦建議推行一套嚴謹的教理講授計劃及教友完整培育計劃。在重複教會需要良好主教，焦點

集中在中國的特殊情況。要指出「一會一團」要在主教們之上並指導教會團體，仍然存在。在這問題上，有需要遵循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的指示，讓教會有清晰指示（負面的個案，包括非法祝聖、合法主教參加了非法祝聖）。在全體會議上，參加者本著愛德去處理這些痛苦的事件，也關注到現實處境的特別困難之處，但也不得不提醒中國教會的兄弟，「犧牲了信仰的、教律的重要元素，根本就不可能有福傳。」最後，為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和修生，要有足夠培育，委員會讚揚在中國開展的各種良好項目。

中國教會的生命力

據最近的報導，中國的主要宗教團體得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批准，設立他們自己的新聞宣傳系統。這個新系統的內容和限制尚未清楚。按照規定，各宗教團體通過各自的發言人，將要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或不定期與傳媒聚會，發表新聞稿或網上發表予新聞媒體和公眾。（《環球時報》，2011年12月14日）希望這些新聞發言人真正能把宗教團體關心的問題正確表達出來。

一個實際的例子，以香港教區湯漢主教為例，他於

二零一一年向教區的天主教徒發表聖誕節文告中，批評當地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人擔憂人們變得更為自私，以增加收益而犧牲公共利益。他寫道：「我們希望，我們祈禱，我們的政府和富人和企業家，進行解決迫切的住房問題，這是每一個家庭的基本需要和權利。」

（《公教報》，2011年12月25日）在二零一二年四旬期文告中，他已經以樞機身份，強調資源分享的價值。在談到即將進行的地方首長選舉，他還要求香港要有普選及自由，實踐民主。在英文《南華早報》的社論中，稱讚湯樞機為改善這城市的利益，亦指出他的語調與前任主教不相同。（《南華早報》，2011年2月21日）此外，香港的宗教領袖們，在一年一度對市民的農曆新春文告中，提及社會價值的重要性。

不少天主教機構，特別是《信德社》（於二零一一年特別為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開設了中、英文博客，）經常報導大陸各地教區團體的慕道班和培育計劃。從中，我們取得一些例子以瞭解今天的中國天主教徒生活。在北京教區，李山主教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在南堂主教座堂為福傳年揭幕，派遣五十名傳道員，要求他們參加為期六個月的準備課程。西安教區（陝西省）也

有約五十名全職傳道員；在二零一一年復活節，有一百五十名成人受洗，分別屬於市內的四個堂區。

在陝西省三原教區，一位神父說他經常邀請其他教區的傳道員來分享信仰見證，他們多是志願者，但是要去偏遠地區傳教卻有經濟困難。鄰近上海的浙江省，有天主教知識分子聯誼會成立約十年，有一千多成員，都在積極投身傳播基督信息。該會在溫州舉行年度會議，有六十八名參加者來自十個不同城市。這些會議也提供了一個朝聖機會，藉以交流信仰經驗和提出具體建議。溫州教區朱維芳主教勸勉他們，要為牧民關懷和福音傳播作出積極的貢獻。

在東北遼寧省，自一九八三年，四個教區已經合併為一個遼寧教區，約有十萬教友，九十位神父、兩個女修會、瀋陽神哲學院等。教區為教友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年的課程，集中在福音工作，內容有哲學、神學、聖經和靈修等。在邢台教區（河北省），一組八十七名女教友，在二零一二年農曆新年後參加課程，內容包括堂區職務、家庭關係、福傳和音樂。一組來自邯鄲教區（河北）的學生，開展了一個福傳網站，許多學生對網站感到興趣。這確認年輕人對於精神生活渴求很大，這也顯

示了互聯網在福音傳播方面越來越重要。

實際上，在大陸有許多教會網站擔任福傳工作，有些屬於教區，也有堂區主辦的。在天主教教友眾多的河北省，設在石家莊的《信德社》與全國各教區有聯繫，週報銷量五萬份，加上其網站的點擊率高。該機構還有《進德公益》和《文化研究所》。在天津教區西開教堂，堂區主任司鐸張良在二零一一年基督君王節，委任了一百七十九位送聖體成員，給予每個人一個十字架和徽章。在過去七年，令到患病教友得以領受聖體，已經近一萬五千人次。他們陪伴神父探訪病人以便辦修和聖事及領受傅油聖事；他們也到已亡教友家中帶領祈禱。他們經過培訓，包括靈修、以聖體聖事為教友生活中心的文件等。在天津教區（有超過十萬教友），西開教堂建於一百年前，於一九八零年重新開放作宗教禮儀之用。該堂區（三萬教友）利用現代科技來傳福音，有開設網站並使用一個博客與公眾對話。

中國教會需要慎思及力量

無需掩飾的是，愛國會一直為自己的面上加點功勞，這包括宣稱讓信仰在毛澤東左傾政策的黑暗歲月中

生存。這不太符合真理。事實上，在所謂的文革時期，所有宗教標誌被剷除，愛國會本身也消失了，連同政權以前所用的很多實體一起消失。它在一九八零年重新組成，成爲一個有效的政治組織，控制教會生活每一方面，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侵略性。

一方面，有些人認爲任何人要在教會內要行使公職，似乎無可避免地要與愛國會合作。過去，有主教不能繞過愛國會，但現實中這些主教又是教廷在合一團結的倡導者和捍衛者。在今天，任何主教、神父或教友去宣稱他們要與教宗及普世教會共融，就會被壓制。愛國會使用這樣的戰術，也許爲了向政府證明本身很重要，但此舉帶來嚴重後果，在天主教團體和在社會中製造不安和混亂。

我相信，直斥某些團體爲「愛國教會」是不公道，因爲在現實中，他們是透過愛國會，遭受政治權力暴力的受害者。我認爲，對那些多年來願意服膺國家和黨，而將對教會的愛列爲次要的人，單純譴責他們爲「裂教」，是錯誤的。在全國各地教會的不同處境，需要明辨，因爲官方及地下團體的關係和制衡，受到無法估量的環境所限制。

在前一章，我提過遼寧教區裴軍民主教，因為拒絕主持汕頭非法祝聖而受到當局懲處。一名中國評論員指出，政府定會盡一切辦法防止其他主教仿效，以免「自選自聖」計劃受阻。他還說，裴主教將來難免要去參加其他非法祝聖，為所有政府認可的主教，將會遇到同樣的困境。（《天亞社》，2011年10月21日）

與這難題相關的另一面是，也有人對羅馬當局表示不滿，指稱羅馬在對於中國教會問題和回應政府政策方面，沒有明確的指示和一致的取向以供人遵從。一位筆名「穆棣」的地下神父，引述了宜賓教區最近祝聖羅雪剛為助理主教為例，候選人是宜賓市愛國會主席卻取得教宗的批准。穆棣說，教廷應該預見到樂山的非法主教雷世銀，作為候任主教的同學和朋友，在政府支持下，將會堅持到場參加儀式。為當局來說，它打算強加自己的政治原則，因為重要的是，雷主教要與其他教廷批准的主教同在祭台前。他說：「事實上，羅主教有發出邀請予雷世銀，已經是給教廷一個耳光。」他評論道：「幾年前，絕大多數在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很高興接受一位教宗承認的新主教，但是這已不再是今天的情況。這喜悅已經變成了焦慮，甚至悲傷，因為我們不知道何時

這認可會被用來令教廷尷尬的工具。」他說，他不相信政府真誠的希望對話。他認為，教廷多次在發出主教任命時，希望說服北京方面不要有太多的批評，並嘗試向北京說明主教人選是重質不重量。據他說，絕罰不解決問題，因為中國人的思維的特徵：「如果一個西方人被逐出教會，無論是他轉化或離開教會（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那樣）；但在中國，一切是偽造的，（這個人）既不改宗，又沒有離開的勇氣。」（《天亞社》，2011年12月23日）

這痛苦的判斷反映了不少未有獲得政府認可的教會團體的感受，他們對於發展下來的情況感到沮喪。也有人要求教廷再次選舉及任命地下主教；這事在本書前面已經提到了，教廷出於盼望與政府達成協議，因而曾擱置地下主教的任命。然而，這一切都不足以解決問題。筆名「甘保祿」的華北神父，來自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他提到了神職主義在中國的環境中已經成為災難性的威脅，他重拾一位美國神學家的想法，認為教會性醜聞令教會在今天的世界中形象被塗黑。當某些神職人員著力追尋權力和榮譽這些不為基督所思念的東西，不可避免地導致虛偽、推諉和與教友疏遠。「在中

國，這種現象是受到父權心態和社會分層的心態所鼓吹。」（《天亞社》，2011年10月18日）

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中國的天主教團體需要更深刻地更新信仰，這就要求他們不斷努力去活出福音和傳教，並與其他的基督教會和諧共存。我們的團體應該向社會開放，受聖經滋養及度聖事生活，令教會更易與人接觸，並促進不同教會團體之間的兄弟情誼和合作。中國教會正在經歷一個極度微妙的階段。爲了克服這問題，需要的不是新的宣言或者法令，而是得到普世教會真誠及平和的團結，這應由羅馬開始，藉分享和見證同一信仰爲基礎，支持他們在苦難和考驗之上善盡各人的本份。（註十）首要的是，盡可能與個別中國主教建立個人關係，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了解他們的具體情況。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向他們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議。

讓神州大地有希望

在這本書的開端，我提及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先知直覺，他看到了亞洲在第三個千年的「福傳的巨大情況下」。肯定有很多人，一如杜小安，看到中國是遼闊亞洲的一部分：「中國肯定被召請成爲教會和整個教會的

良好來源。基督需要中國、其信徒的信仰、它的靈魂和生命的氣息，瀰漫整個文化。」

書中指出中國教會面對著許多障礙，唯有信靠天主。中國基督徒在共產黨政權下的重大經驗，令人想起古羅馬帝國時一位學者的例子，他是屬於少數社群在奮力求存。（《耶穌的戰爭》作者大衛·詹金斯（David Jenkins）。為一個信徒來說，天主沒有什麼不可能的，這已經有足夠理由依靠祈禱，要堅持和毅力。（註十一）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簽發了他的信函，呼籲中國天主教徒更新他們「我們的主耶穌的信仰共融，以及對教宗的忠誠」，他保證與中國信徒一起「祈求你們之間的合一日益更深。」他還訂立了五月二十四日特別向聖母瑪利亞敬禮的進教之佑日（在上海的佘山聖母朝聖地），成為「為在中國的教會的祈禱日」。之後，他每年都有遵守這承諾，並向在羅馬的各信友團體作出祈禱呼籲。

在二零零八年五月為中國的祈禱，教宗籲請聖母瑪利亞支持，使他們成為祂的愛的「可靠見證人」，並「團結在伯多祿磐石，教會建於其上」。（《亞洲新聞》，2008年5月16日）在二零一一年底教宗接見群眾時說：「我

們讓瑪利亞啓發那些有疑問的，帶領那些迷失的，安慰痛苦的，加強這些受幻想機會主義所誘使的人」。他還提及「在中國的教會，特別是在當前，需要普世教會的祈禱。」（《亞洲新聞》，2011年5月18日）

佘山大殿一向吸引來自中國各地的萬千朝聖者，但在最近幾年，中國當局限制到山頂朝聖地。年邁的金魯賢主教，二零一一年五月帶領上海朝聖者在佘山舉行了莊嚴的彌撒。教宗本篤十六世再次邀請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朝聖者，與中國的兄弟姐妹一起祈禱，向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祈禱。他說：「他們可以懷著謙卑和喜悅，宣布與復活的基督一起，忠信於他們的教會和伯多祿繼承人，在每天生活中，把宣認的信仰活出來。」（《亞洲新聞》，2011年5月20日）◆

註釋

註一：在中共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各方期望有新路線，促進發展「和諧社會」。然而，有權威評論員持懷疑態度，包括林和立，他在詹姆斯頓基金會中國簡報表達此意見。報導也在《亞洲新聞》期刊登載（2012年2月，第29-32頁）。參閱相關報導：《亞洲新聞》，2012年5

月 14 日。

註二：訪問刊登在北京《環球時報》（2011 年 12 月 29 日，第 2 頁），標題是《毛澤東的魔咒，以及打破它的必須性》。

註三：在討論發展緩慢，卻有一位台灣新書店“Eslite”創始人兼董事長，（該書店在台有 48 個分店，每年有九千萬人次到訪）受到大陸多位市長邀請在其城市開設分店，提供折扣價格出售土地。中國城市一向的文化象徵是新華書店。（亞洲時代在線，2011 年 12 月 10 日）。

註四：沙百里出版的《中國天主教指南 2008 年》，中聯，新加坡；有一更新版快將出版。多年前，我與一些朋友一同訪問中國，留意到教會很少提供獎學金，來幫助貧困教區的修生。結果幫助了約 20 個修生成為神職人員。

註五：一個主題為「天主教人物史」的研討會，在 2011 年 2 月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台灣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古偉瀛指出，關於在中國天主教史，約有 150 個中文書籍和文章。

註六：《英文公教報》，2012 年 1 月 15 日；意大利《將臨報》，訪問柯毅霖，2012 年 2 月 22 日，第 24 頁。

註七：作者認為，第一代和第二代新皈依者的信德脆弱，逐

漸這便成爲家庭傳統，從中受益，也有助發揚孝道。這點是受到考驗，因爲新的皈依者發現自己被迫不再祭祀先人，爲傳統保守的文人帶來非議。因此，「數百年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被文人及朝中有影響力的人拒絕，所以他們的信仰扎根在貧苦農民中（...）從福音傳播的角度來看，基督徒的貧困並不一定代表軟弱。基督徒應該關懷團結窮人，而希望獲得全國知識分子的尊重。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爲國人做出貢獻。」《基督徒在中國》，第 542 頁。

註八：“A Shanghai qualcosa si muove”，《梵蒂岡內幕》，2011 年 12 月 30 日。

註九：參閱梁作祿，*La Chiesa Cattolica in Cina - La “politica di libert? religiosa” dopo Mao*, Jaca Book, Milano 1982, especially pp. 226-232. An English and a Chinese edition wer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See also the review by G. Rulli, in *Civilt? Cattolica*, quaderno 3183, 1983, I, p. 307.

註十：我們希望中國教會歡迎教宗本篤十六世這封重要信函，並感到教宗親切如一位父親、牧者和老師。這也是教宗希望見到的。他在擢陞 22 位新樞機的樞密會議

上說：「請爲我祈禱，我不斷爲天主子民做見證道理，以堅定及謙虛的手帶領聖教會向前邁進。」

註十一：這指出意大利所有 530 間度默觀生活的女修院：在 2012 年農曆新年，她們收到一本我編輯的書以及一封信解釋中國當前嚴峻的情況，籲請她們爲中國教會祈禱。該書包括一位年輕傳教士的信，他在日本侵華時期犧牲性命，他是里切薩雷神父（Cesare Mencattini）。

【後記】二零一二年以來的 中國天主教會：另一個困局

柯毅霖神父撰文

數十年來，梁作祿神父在推動宗座與中國官方交談方面一直舉足輕重；他熟悉中國天主教會的現況，他博引實據、不斷分析和反思；特此指出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開始，宗座及中國教友跟政治局的關係急劇惡化。眾所周知，事緣於先有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承德地區非法祝聖了郭金才爲主教，接下來十二月七日至九日舉行過全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後，雙方關係更一落千丈。及後連串非法祝聖主教陸續出現，先有雷世銀在樂

山被非法祝聖（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繼而是黃炳章在汕頭接受非法祝聖爲主教（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此兩件事梁作祿神父已作詳細記述。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在黑龍江哈爾濱被非法祝聖爲主教的岳福生，宗座早已責成他不能接受此等祝聖禮，而在此期間趙宏春（教廷任命的哈爾濱宗座署理）及張希盛兩位地下神父則被強行押往逾百里以外之處。宗座基於岳福生信德薄弱及依附政權，亦公開宣布其即時生效的絕罰。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當時岳神父已是其教區副主教，並出席了在馬尼拉舉行的普世青年節，那天他與百位司鐸一同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共祭；他看見台灣（中華民國）國旗飄揚，其餘的中國代表也退場去了，但他仍留守於會場馬尼拉黎撒公園；彌撒後他更請求把慶典中印上教宗肖像的領帶送給他。

不過，當日如此堅信的岳神父卻成爲了一個反面的典型例子，教大家看清楚政府當局如何成功的把忠貞的司鐸拉攏，並背離了其普世教會的身份；至於岳神父如此輕易便被宗教局操控，可從其祝聖禮後的行爲見一斑：他一直只表達了官方的路線，置其他神職人員出席

非法祝聖禮帶來的嚴重後果於不顧，七位拒絕出席的司鐸遭恐嚇會被逐出各自所屬堂區，不欲被逐出教區的司鐸則要向主教表達道歉及與其共祭。

至於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被祝聖為四川南充主教的四十七歲陳功鰲神父，以及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祝聖為湖南長沙教區主教的五十歲屈藹林神父，均為先後獲得教廷及中方認許的，但二人卻被迫主持嚴重違規的祝聖禮；中方之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了讓每位神職人員都蒙污點，不能獲教友的絕對信任，以方便控制。

這些美其名為「雙方同意」的聖秩授予，卻導致中方官員與中國教友長期陷於衝突；而安排單一或多位非法主教進行祝聖，是罔顧天主教傳統的行為，也證明這些官僚絕無與教會有溝通之餘，更旨在侮辱教會，而且在近日的祝聖禮上動輒以數以十計公安人員來宣威，他們也對教會干預與操控，包括強行宣布所謂主教團（異於教會的體制）之任命，但任命絕非來自宗座。

今時今日中國政府要收買主教和神父，已不再是昔日的囚禁、恐嚇或以暴力手法對付，取而代之的是豐錢厚禮，教人痛心的是接受官方聖秩或積極參與主禮的固然獲厚酬，即使只作共祭的亦能分一杯羹，政府以腐敗

人心的方法來驅使他們變節，而不少人也在厚餌之下倒下，因為政府可為他們的家鄉和聖堂帶來利益，如汽車和電腦等，又或者可為他們的建築物維修及擴建，甚至可惠及修女團體等。

要抵住這些利誘實在需要無比勇氣，不過打著為「教會益處」的也不過自欺欺人吧。當然不少人也能力拒這些誘惑，為普世教會樹立了芳表，也讓全球主教、教會高層和一眾樞機見證了他們的美德，這剛好跟那些視聖職為職業，或視之可帶來權力及財富的教士成強烈對比。感謝天主，他們之中仍有不少表表者，像上海的馬達欽主教，他為我們帶來了希望。

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主教座堂舉行了上海新輔理主教祝聖典禮，以填補邢文之主教留下的職務空缺，雖然是次提名獲中梵雙方同意，但政府只視金魯賢主教為教區首長，現年四十五歲的馬達欽主教則只為金的助理主教；不過金魯賢是羅馬所承認的范忠良主教的助理主教而已，政府這樣做也代表了無視教廷。此外，政府也強行讓不獲教廷認可的福建（福安）主教詹思祿出席祝聖禮，使不少神職人員、修道者和信友決定不參與該禮儀。

馬達欽神父以非常方法阻止了非法的主教在祝聖典禮彌撒中進行覆手禮，當宣讀愛國會主教團對他的提名信時，揚聲器突然失靈，而彌撒結束前這位新主教更公開宣布脫離愛國會，他的舉措教眾人驚嘆，其簡短的結語贏得在場信友熱烈掌聲，並在某幾個互聯網上流傳了數天，直至被當局封鎖為止。馬達欽事件被公認為中國天主教會震撼的逆轉，而其舉動也被公認為充滿先知性，並極具影響力。

與此同時，在場的宗教局人員對馬達欽的言行感到無比憤怒，他們離開了宴會並即晚把馬主教帶走了，大家都相信馬主教被軟禁在佘山修院內，斷絕其跟外界有任何接觸，但馬主教的網站仍在運作，偶爾還加添了些古文內容或文言文的禱文，不過外間都不能知道這些訊息是否由其本人發出，但從其對古文的熱愛，以及其行文之內容，是表達了他雖身在困境，但卻有著基督徒的決心和堅持。上海教友普遍認為，如果馬主教不就範，短期內，甚至數年之久，他不可能恢復自由。當局查問了上海教區逾百位神父和修女，他們均曾拒絕出席這一次有詹思祿參與的祝聖禮。

上海的氣氛仍然緊張，司鐸和教友都談論和推算此

事的結果，大家都意識到這是一項逆轉，首次有愛國會主教公然反抗政府的強壓，教人推測馬主教可能是回應了陳日君樞機和韓大輝總主教的強烈呼籲，也令人聯想到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數以千計神父、修女和教友跟隨勇敢的龔品梅主教（後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陞為樞機）一同被捕入獄；當日被視為是上海教會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教人緬懷且可敬的龔主教公開堅決地拒絕背離教宗，換來長達三十年的牢獄之苦，相對而言馬達欽主教的情況不致像其那麼嚴重，但也反映出大家都認識到上海教會經歷過的苦難和堅持。

政府出手之迅速甚為罕見，彷彿是中央要向上海官方傳達，要避免事情進一步鬧大的訊息。當馬達欽繼續被軟禁的同時，官員亦在教區進行調查，期間內地不少網站都不斷表達支持天主教會，並贊同馬主教的取態，認為他是真英雄；有教友在互聯網以筆名發表了個人感受，更發布到境外，當中一位署名為「慎謙」的教友，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去信天亞社，其文章如下：

須知道天主教的特性在於教會對教宗領導的服從，並服從教會法律和法規，以體現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特色，所以在天主教內，主

教只該由羅馬教廷來認可，而主教職務亦應是為了牧靈的需要，因他們是信眾的精神領袖，為此中國共產黨不能代替教宗作為天主教信仰的精神領袖，更不該干涉教會內部的信仰管理體制，尤其是於祝聖主教這方面，現時馬達欽主教的事教執政者迷茫，他們已忘了宗教信仰原來的價值……

不管是好是壞，我們也得為此事好好反省，而並非給馬達欽主教施加更大壓力，有關當局應給他多點自由空間……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對教宗非常尊重，也跟教廷建立了良好關係。數月前教宗訪問古巴時，該國領袖卡斯特羅也曾拜會他，即使是越共也非常尊重教宗，還透過代表跟教宗交談……中國共產黨正好就是要學習二者對不同宗教的尊重和支持。

香港的陳日君樞機主教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也特別舉行了一台彌撒，以表揚和支持馬主教，不少神父也出席共祭，也有逾千教友參與，而湯漢樞機也透過《天亞社》，譴責軟禁馬主教的行爲，宗座則僅在早前對擢升馬達欽爲主教表示滿意，但自始之後卻三緘其

口。我們毫無疑問正面對政府嚴重的倒行逆施，這確實成爲了中國天主教史錯綜複雜的片段，而最教人詬病的，是在二零一零年之前數年間進行過多次氣氛緩和的交談並曾帶來希望，但現已落空了。梁作祿在其著作中敘述這些事件時，對侵犯天主教信徒（神父、修女、主教及教友）個人宗教自由的嚴重行爲，都毫不留情地指責，包括違反他們意願強迫他們出席非法祝聖禮，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在北京進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這些事使到國內的天主教團體感受困擾；宗座顯然未有意料到此事將發生，而當下能作的事亦不太多。

有些梵蒂岡的要員顯然不熟悉中方在宗教方面的政治手腕，甚至天真地以爲可透過協商來阻止非法祝聖及北京的會議。在中梵欠溝通的情況下，漁人得利者莫過於劉柏年，在這數十年來他爲政府管控著天主教會，並出任愛國會首領，地位穩如泰山；利用馬英林與房興耀兩主教作他們組織的代表，但實在只是其傀儡；唯一能令政權頭痛，還爲天主教團體帶來希望的，是勇敢的馬達欽主教，但他最終能否成功，則仍屬未知數。

對於梁作祿的憂慮，筆者也有同感，確有部分神父和主教，在孤獨和無奈之下受到官員的哄騙，而聖座亦

每每未能明確而有效的和他們溝通，加上深受中國刻下令人鬆懈的國家思想感染，導致他們的思想終被政府主宰了，而梁在引述沙百里對此現象分析時，亦感到不少地方也趨向相信中國教會即使脫離了羅馬亦無妨。書中有部分篇章強烈指出，這種概念不僅遠離了正統天主教，也走上了分裂的路。此刻的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實在較任何時候更需要羅馬及全球天主教會攜手鼓勵和支援以追隨羅馬教宗，他是基督委託作為普世教會有形可見的首牧。

從濃厚信仰傳統生活急劇轉變為滿全世俗化需要，中國教會明顯出現極大困難；一如世界其他地區，中國社會所面對急速而全面的現代化，這對天主教信仰的實踐和傳播產生了極大的挑戰和威脅。在共產主義者殘酷迫害的年代，無數勇敢信眾以生命作見證，成為教會團體的主要支柱，不過年輕一代從農村湧到城市，公教家長都難以把信仰傳予下一代，新一代也給鋪天蓋地的物質主義引誘和征服了。

中國社會的世俗化對天主教會產生負面衝擊，信眾數目長久沒明顯增長（相對於許多基督教派），聖召也越來越少，修道的婦女數目亦下降，城市中的聖堂也欠

缺吸引力，尤對青年為甚，教會缺乏福傳衝勁，沒有吸引年輕人的動力，也未能在社會中抓緊大家的注意力。有些來自傳統天主教家庭的司鐸亦抱憾的表示，未知是否因社會變遷所致，他們的後輩已不再上教堂了。不過很幸運的是在北京、上海及西安等城市以至河北省各地，都出現了正面的例外。

在這普世問題下，中國教會被未能提供促進靈性成長的適合的培育課程以支持教會團體及牧靈生活而深受困擾，而司鐸和修女亦不斷受著宗教事務官員的施壓，也常感到要在如此環境下難以滿足教會需要，所以我對勇敢的馬達欽主教，以及在中國無數年輕神父、主教及修會人士表示由衷的尊敬與支持，他們都明白如何把福傳置於首位，如有機會我會跟他們說：「你們要自由、勇敢抗衡無理打壓，要有捨棄主教職或其他特權，莫蒙蔽良心使生命蒙羞，真理會讓你們自由的。」

可惜，在政府壓力下折腰者也大有人在，但結果只會換來品德沉淪和不斷妥協，因為一次失足便會被政府無休止的主宰和利用，而在這些處境中的主教和司鐸也越來越憂鬱和孤立，他們難以擺脫官員的控制和政府設下的陷阱，甚至當臨終之時也不獲安排接受修和聖事、

病人傅油、領受聖事，以至符合宗教意義的葬禮（從不合法的北京主教傅鐵山離世時的境況可見一斑）。

這些年來顯而易見中國教友絕對不希望由非法主教管理，非法主教只為沒羊群的牧人，福建閩東的詹思祿正好是典型例子，沒信眾參與他的彌撒，差不多所有神父都不願見他，陪伴他的只有宗教局人員，迫令他做些極可悲的任務，如在上海佘山的一幕。反觀馬主教則獲得全體的支持，包括在互聯網上的討論：顯而易見教友、修會人士及神父或主教，都不希望有獨立自主自辦的教會出現，而官員至今卻仍不肯接受現實，真教人氣餒，但政府竟死不罷休的以一切人力物力貫徹他們的政策，何不把這些資源用於更有價值的事上呢？

執行宗教政策的官員對信眾、修女、司鐸和主教不斷加控和施壓，尤其是特別針對年輕的主教和司鐸，而神職人員因為未能在牧民服務中獲得真正自由，所以其熱誠也深受打擊，不少具創意的新牧民措施都被保守的官員否決而不獲准推行，因為他們都不願冒上違反宗教法的風險，所以一律採取寧枉毋縱的手段，這使年輕教會領袖受挫並失去信心。正如前面提及過，有些神職人員為人詬病的錯失（不僅為品德方面，亦包括濫財，以

及在教會及政府體制中爭取權力的野心)，不少人因而離開鐸職，而面對中國教會重表福傳活力的急切需要，且不容有失，我們值得參考一些基督教或福音派團體在中國拓展的經驗，他們的表現遠勝我們。

宗座方面大概會對與羅馬關係密切的大多數天主教成員作表揚、鼓勵和支援，但亦同時必須不能失卻與普世教會及教宗神學上的共融；梁作祿神父重申，中梵的建交問題仍是傳媒關注，而即使羅馬的政治及教會高層，都曾努力希望為所有問題尋找出路（雖然至今成效不彰）。多位樞機的外交舉動及訪華尚未結出希望的成果；現時更有跡象顯示北京沒興趣和教廷建交，因北京不會為馬英九領導的台灣帶來跟宗座斷交的恥辱，為此中梵關係被無限期擱置，故此期望中梵建交可解決中國天主教會問題也顯得不切實際。

撇開無結果的對話以及一再失望，目前首要確保的是中國教會利益，而首要任務是把千瘡百孔的牧民活動和福傳振興。正如梁神父所言，我們仍抱有希望：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獲教宗本篤十六世擢升為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的華人神學家韓大輝總主教，可望透過在牧民和福傳方面更努力、投放更多資源、創意和關

注，為完成這任務作出貢獻。此外，我們也期待曾在香港主管了八年「中國研究小組」的萬民福音部傳播部長斐洛尼總主教有更多作為。

中國教會目前對著沉重的任務，在現代化的挑戰之下，它欠缺了長遠福傳計劃，其實在中國基督愛的見證比比皆是，但相對幅員廣大而複雜的中國社會，這些見證微細得起不了任何衝擊；此外，研究事工能分析教會現況從而為信眾和牧者解決跟教會未來關係等種種深遠問題，但可惜中國教會在這方面幾乎完全欠奉。

我們在近年數度追憶中國傳教事工奠基者利瑪竇神父及其最傑出門生徐光啓，後者為科學家及政治家，對上海以至全中國的科學、文化、宗教及社會方面均有重大貢獻。我曾奉委協助申請利瑪竇列入聖品的工作，也關注到在上海教區將徐光啓的列聖要求提上議程（一九三二年已首次提出）。這兩位基督徒及教會領導人是我們光輝的典範：二人的友誼合作，即使在今時今日仍能行之有效，他們明示了成為出色的天主教徒，亦可同時為傑出公民，為國家進步出力。交友之道有福傳價值，亦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德行，為解決中國教會現在的困難，以及打開彼此尊重和合作的不二之選。我們給

政府的進言是，如要建立和諧社會，應建的是橋樑而非圍牆；請讓利瑪竇和徐光啓以其光輝歷史來啓發我們作出抉擇。

我也要向中國的年輕主教、司鐸和修道人忠告：羅馬儘管不一定完美，但仍為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教宗聖父跟你同在：羅馬有許多人（實際上是整個教會）都誠意和你一起並支持你。在現時的困境中並非每事都能如願，但能做的事仍不少，要遵從教宗的明確訓導，並徹底的學習它，別讓權位和金錢誘使你迷失。

請別猶豫，要讓教宗以具愛心的慈父耳朵來聆聽你們的苦和愁；雖然你們相距很遠，但也非遙不可及的。也要讓萬民福音傳播部，以及羅馬及世界各地相關部門知道，如何回應你們的實質需要：包括培育、福傳、牧民資源方面及靈修生活上的幫助。如果你們誠意的尋求教會內團結合一，這訴求必獲更深遠的關注和正視。而事實上，耶穌基督所要求的合一在歷史上是成功之匙，也使教會真正成長。整個教會團體都愛護和信任你們，也欣賞你們的作證和勇敢，並會因著你們重新振起的福傳活力，激勵出具力量的信仰生命，這為眼前的信德年更別具意義。◆